陆地与海洋

一

人是一种陆地动物，一种脚踩着陆地的动物。他在坚实的陆地上驻足，行走，运动。那是他的立足点和根基；他由此获得了自己的视角；这也决定了他观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作为一种在土地上诞生并在土地上运动的生物，他不仅因此获得了自己的视野，而且也由此获得了行走和运动的各种方式。因此，他将他生存于其上的这个星体称为“地球”，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这个星体表面几乎四分之三的范围被水覆盖着，只有四分之一是陆地，而且，即便是最大的洲也不过像是一个浮动的岛屿罢了。自从我们得知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球状体以后，我们仍是想当然地称其为“地球”。如果非得把它想象为一个“海球”，你会觉得

这很怪异。

我们所有此岸的存在，幸福与不幸，欢乐和痛苦，对我们而言皆是“属地的”（irdische，世俗的）生活，地上的天堂或者地上的苦海，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因此，以下情形就不难理解了，在很多神话和传说中——各个民族在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保存着他们最古老、最深厚的记忆和经验——大地是以人类的伟大母亲的形象出现。在诸神中她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神灵。许多神圣的典籍告诉我们，人出自泥土，又将回归泥土。土地是人的慈母般的根基，据此，人自身乃是土地的儿子。在其同胞中他看到了他的手足兄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四元素——土、水、火和气——中，土对人而言具有着确定的意义，它最大程度地决定了人的命运。乍看上去，下面这样一种想法似乎显得只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即人的存在可以被除土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元素在同样强烈的意义上予以决定。人既不是鱼，也不是鸟，更不是由火构成的生物，如果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的话。

如此说来，难道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在根本上是属土的（erdhaft）并且仅仅与土相关，而其他几种元素真的只是第二位的附属于土元素的东西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样一种提问——即是否还有某种纯粹属土之外的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理解。你只需走向海边，放眼远眺，动人心魄的海平面立马会映入你的眼帘。值得注意的是，当人站在海边，他会很自然地从陆地向海洋眺望，而不

是反过来从海洋向陆地眺望。在人的深层的、常常是无意识的记忆中，水和海洋乃是一切生命的神秘源头。大多数民族在他们的神话和传说中不仅能够回忆起土生土长的神灵和人类，而且也能回忆起从海洋中诞生的神灵和人类。它们都提到了有关海洋与湖泊的儿女的故事。阿芙洛狄特（Aphrodite），代表女性美的女神，是从海浪的泡沫中脱颖而出的。海洋还孕育了其他的后代，我们在后面还将认识“海的儿子”以及野蛮的“海上漫游者”，他们与那个从浪花中诞生、代表着女性美的充满魅力的形象很少有相像之处。在这里，你会突然发现另外一个与土地和坚实的陆地迥然不同的世界。此时此刻，你会明白，诗人、自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会在水中寻找一切生命的起源，而歌德则在他庄严的诗行中这样吟咏：

> 万物皆来自水，
> 一切皆由水保存，
> 大海啊，
> 你才是永恒的统治者！

通常而言，人们会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公元前 500 年）看作这样一种理论的创始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存在的根基是水。然而，这种观念与泰勒斯的时代相比，不仅更为古老，同时也更为年轻。它是永恒的。在晚近的 19 世纪，德国一个名叫洛伦茨·奥肯（Lorenz

Oken）的伟大学者认为，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都起源于海洋。而且，在由达尔文派的自然科学家们建立起来的进化树的图式中，鱼和陆地动物以不同的顺序排列在一起。海洋生物在此扮演着人类祖先的角色。人类的起源史和早期历史似乎证实了这种海洋起源说。著名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除了土著或者说在陆地上诞生的民族外，也存在着纯粹依赖海洋的民族，他们从没有成为脚踩陆地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坚实的陆地上的任何事情，除了下面这一点，即陆地乃是其纯粹的海洋存在的边界。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在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那里，在卡拿肯人和撒沃利人那里，人们仍然可以识别出这种鱼人的最后残余。他们的全部存在，他们的想象世界和语言都与海洋息息相关。我们在坚实的陆地所获得的关于时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是如此陌生和难以理喻，正如反过来对我们这些大陆人而言，那种纯粹的海洋人的世界代表着难以把握的另外一个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是我们的元素？我们是陆地的子孙抑或是海洋的子孙？答案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最古老的神话，现代的自然科学假设以及关于早期历史研究的结果都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二

我们需要对“元素“这个概念作个简短的解释。从刚刚提到的哲学家泰勒斯开始，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的伊奥尼

亚自然哲学以后，或者说公元前 500 年以降，欧洲民族开始谈论四元素。从此以后，尽管有很多科学批评，四元素——土、水、气和火——的说法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活生生的观念。现代科学将这四种基本元素予以分解；如今，它已经区分出了九十种以上的有着完全不同结构的“元素”，且弄清楚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基本物质，这些物质无法被现今的化学方法继续予以分解。现代科学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所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元素与那四种基本物质只有名称上的共同点。如今，任何一个物理学家或是化学家都不会声称，那四种古老元素中的任何一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基本物质，就像米利都的泰勒斯所说的水，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尼所说的气，以及阿戈里艮的恩培多克勒所说的这四种元素的混合一样。单单以下问题——即原始物质、基本物质、始基和根源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会把我们陷入意想不到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的以及同样意想不到的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为了我们的历史考察，我们仍然不放弃四元素说。对我们而言，这些元素乃是是朴素的、直观的名称。它们代表了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仍然继续使用它们，尤其是在这些元素所代表的源初意义上谈论陆权与海权。

我们不能把下面将要谈到的陆地与海洋这两种元素理解为单纯的自然科学量度，否则它们就会立刻分解为化学物质，也就是分解为历史的虚无。由这两种元素生发出来的种种规定、尤其是历史存在中与陆地和海洋相关联的种种形式

并非是以机械的方式被动地进行的。如果人只不过是完全由其环境决定的生物，那么，他相应地就将是陆地动物，或者一种鱼，或者一种鸟，或者所有这些基本规定的某种奇妙的混合。这四种元素的纯粹类型，尤其是，纯粹的陆地人和海洋人彼此之间将很少会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彼此之间将毫无关系，而且，他们彼此之间越陌生，他们的存在方式也就越纯粹。而混合则会产生优良的或者糟糕的存在类型，且会产生友谊或是敌意，就像化学中的亲和性和排斥性一样。人的存在和命运就将完全由自然决定，就像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和命运一样。人们将只能这样说：一些人吃掉另一些人，而其他人则彼此共同生活在一起。这将使那种由人的行动和人的决断构成的人类历史不复存在。

然而，人如今已是一种无法单纯地被其环境所主宰的生物。他拥有历史地获取其存在和意识的力量。他不仅知晓他的出生，也知晓重生的可能性。在某些困境和危险中，动物和植物如置身于其中就会无助地陷于毁灭，而人却可以凭借其精神，借助精确的观察、推理以及决断将自己拯救出来，并获得某种新的存在。他自身拥有着某种权力和历史权能的游戏空间。他可以选择，在某个历史瞬间，他甚至可以借助自己的行动和业绩对作为其历史存在的总体形式的某种元素作出决断，由此重新调整和组织自己。在此意义上，如理解得没有错误，正如诗人所说，人有“去他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三

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一位名叫卡斯特克斯（Castex）的法国军事学家兼海军上将把他的一本战略书籍冠以“海洋对抗陆地”的书名。他由此而从属于一个伟大和悠久的传统之中。自远古时代以降，人们就开始关注陆地和海洋的对抗，而且，大约在19世纪末期，人们喜欢将当时的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成这么一个画像，即北极熊与鲸的争斗。鲸在此乃是一种巨大的、神秘的鱼，利维坦（Leviathan），关于这种鱼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而北极熊则是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陆地动物的代表。根据中世纪所谓的卡巴拉主义者们的解释，世界历史乃是强壮的鲸鱼亦即利维坦与同样强壮的陆地动物波希墨特（Behemoth）之间的争斗，波希墨特被人们想象为一种公牛或大象。利维坦和波希墨特这个名字源于《约伯书》（第40、41章）。卡巴拉主义者声称，波希墨特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而利维坦则用自己的鳍堵住这个陆地动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无法进食和呼吸。它描画的乃是陆权国家被海权国家封锁且被切断补给线，以至于饥馑而死的情形，它是如此的直观，只有一个神话意象才能把它表现出来。这样，两个彼此争斗的势力彼此杀死了对方。然后，犹太人——这些卡巴拉主义者继续宣称道——开始隆重地欢庆千年的“利维坦盛宴”，海因利希·海涅在他的一首著名

诗歌中曾经讲述过它。关于这一利维坦盛宴的历史解释，人们大多喜欢引征一个名叫以撒·阿伯拉维尔（Isaak Abravanel）的卡巴拉主义者的话。他生活在 1437 年和 1508 年之间，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起初是葡萄牙国王的财务总管，后来成了卡斯蒂尔国王的财务总管，1508 年在威尼斯去世时已是声名卓著。他了解这个世界及其财富，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现在，让我们在陆地与海洋的争斗这一历史视角下查考一下世界历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吧。

希腊的古代世界诞生于海洋民族的航海和战争活动。“海神并非毫无缘由地训练它”。一个称霸克里特岛的海洋力量驱逐了来自地中海东部的海盗，创立了一种文化，其难以言传的魅力由于克诺索斯的考古发掘而呈现在我们面前。一千年之后，依仗由船只组成的木制长城，雅典这个自由的城市在撒拉米海战（公元前 480 年）中迎击它的敌人，“强大的波斯人”，并由此得以自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败给一个陆地力量斯巴达，然而作为陆地力量，斯巴达却无法将希腊诸城邦和部族统一起来，也无力统领一个希腊帝国。相比之下，罗马——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农业共和国和纯粹的陆地力量——却在与海洋和商业力量迦太基的战斗中跃升为一个帝国。罗马的历史经常——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某些方面、抑或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漫长较量这一章节——被拿来与其他世界史上的冲突和事件作比较。这种比较和类比可能会非常富于教益，但它们也常常导致种种令人生疑的自相矛盾。比如，人们把英帝国时而与迦太基、时而与罗马作类比。种种诸如此类的比较大多像一个两端分别有一个把手的拐杖，人们可以抓握任何一端。

汪达尔人、撒拉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将海洋上的统治权从日渐衰落的罗马帝国手中夺了过来。阿拉伯人经过多次挫折后于公元 698 年攫取了迦太基，并建立了新都突尼斯。由此开始了它的长达数百年的对西地中海的统治。东罗马的、由君士坦丁堡统治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滨海帝国。它仍然支配着一个强大的舰队，并拥有一种充满神秘的战争手段，即所谓的希腊的火器。尽管如此，它还是完全被迫陷于防守地位。不过，作为海权力量，它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卡尔大帝的帝国——一个典型的陆权力量——所无法做到的；它是真正的“延迟者”（Aufhalter），一个“阻止者”（Katechon），正如人们用希腊语所称的；尽管羸弱，它还是持续数百年抵御了伊斯兰的入侵，并阻止了阿拉伯人夺取整个意大利的计划。否则，就会像当时在北非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古代—基督教的文化被连根铲除，意大利被伊斯兰世界吞并。此后，由于十字军东征，一个新的海权力量出现在基督教的欧洲：威尼斯。

这样，一个新的神话般的名字进入了宏大的世界历史。在将近 500 年的时间里，威尼斯共和国被视作海权的象征，一个建立在海上贸易的财富的象征，还被视作高层政治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被认为是“所有时代的经济史上的稀有创造”。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那些英国的崇拜者们对于英国

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的艳羡都曾经被威尼斯拥有过：巨大的财富；外交上的优越性，即作为一个海权力量知道如何利用陆权力量之间的矛盾，借助其他政治力量为其打仗；一部贵族宪法，它似乎解决了内政的秩序问题；对于宗教的和哲学上的意见的宽容态度；自由思想和政治流亡的避难所。此外，还有盛大的节日和艺术美所添加的动人心魄的魅力。这些节日里，一个尤其能攫取人们的想象力，并且使得威尼斯名扬天下的，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盛典：“与海结亲”。每年耶稣升天节前夕，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Doge）都要乘坐着国家的豪华船只向海洋进发，把一个象征着与海洋联姻的戒指抛向海潮中。威尼斯人自身、他们的邻居以及来自远方的民族从这一仪式中看到了一种明确无误的象征，这种象征使得这个从海洋中诞生的权力和财富披上了神话般的庄严性。然而，当我们重新探究这个仪式的根本含义，我们还将了解到，这个美丽的象征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从公元 1000 年至公元 1500 年，这个童话般的海洋女王在不断增加的荣耀中闪闪放光。公元 1000 年左右，当时的拜占廷皇帝尼克夫·佛卡斯（Nikephor Phokas）还不无正确地宣称：“对海洋的统治唯我一人耳。”500 年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对威尼斯人这样宣称道：“迄今为止，海洋是你们的新娘，从今往后，它属于我。”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威尼斯的海权控制了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在此期间诞生了一个神话，一直到 19 和 20 世纪这个神话仍然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和全欧洲著名的浪漫主义者——像拜伦、穆塞特（Musset）、理查德·瓦格纳、巴耶斯（Barres）等诗人和艺术家——前往威尼斯，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神话的魔力。我们绝没有在它耀眼的光环上涂黑的想法，然而，当我们提出如下问题，即威尼斯是否是一个海洋性存在，是否真正选择了海洋这一元素时，那么，我们将立刻意识到，一个仅仅局限在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盆地的海权是多么的狭小，尤其是当一个一望无际的全球性的海洋空间在我们面前打开的时候。

四

一个名叫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德国地理学家——其思想深受黑格尔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在其“比较地理学”（1845 年）中，从水的角度出发界定了帝国发展的几个阶段。他区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部宏大戏剧的三个情节。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冲积平原和尼罗河畔的河流文明，如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以及埃及帝国。接下来则是所谓的由内海和地中海盆地形成的内海（thalassische）文明时代，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期以及地中海的中世纪时期是其代表。伴随着美洲的发现和环球航行，历史迎来了最终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即海洋文明的阶段，其担纲者为日尔曼诸民族。为了把事实尽量弄清楚，我们将使用他的这个三分法的分析性图式，即河流，内海和海洋。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威

尼斯的海权力量为什么在第二阶段、即内海阶段就搁浅了。

刚才提到的“与海结亲”的盛典正好可以使得这一区别予以廓清。这种与海洋联系起来的象征性举措在其他以海洋为导向的民族那里也有体现。比如中美洲的以捕鱼和航海为业的印第安部落，他们为海神祭献项链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动物甚至是人。然而，我并不相信，维京人和真正的“海上漫游者”会张罗诸如此类的仪式。他们对虔诚有着同样的需要，或许有着同样的祈求神明力量的需要。但是，他们可能从不会考虑诸如与海洋订婚或是结亲的仪式，这恰恰是由于他们乃是真正的海的传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与海洋这一元素同呼吸共命运的。与此相比，那种象征性的定婚或者结亲仪式则预设着：献祭者与他所献祭的神灵乃是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相对立的存在。借助这种祭献，某种陌生的元素将会得以安抚。就威尼斯的情形而言，这种仪式清楚地表明，这一象征性的行动并非是从一种根本的海洋性生活方式中获得意义；在此情形中，更为可能的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滨海文化或环礁湖文化创造了这一隆重象征的独特风格。那种建立在单纯的航海以及利用有利的港口位置的文明与那种将一个与陆地相维系的民族的历史及其整体存在转向海洋这一元素的文明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

公元1000年左右，威尼斯这个滨海帝国通过一次通往达尔马提亚的航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威尼斯对于其后方腹地比如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统治始终是不稳定的，正像一个仅仅凭借舰队就想统治一个陆地国家的政治力量所常常遇到的那样。甚至从造船技术这个角度来衡量，直至1797年覆亡时为止，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有超越地中海和中世纪时的水平。像地中海的其他民族一样，威尼斯人只知道有桨船和橹舰。而庞大的帆船航行是从大西洋引入地中海的。威尼斯的舰队却仍然是一支由桨作动力的巨大的橹舰组成的舰队。就像古代时那样，在有利的顺风时刻，帆才作为辅助手段予以使用。一项特殊的航海成就乃是将罗盘完善至现代的形式。正如卡普（Kapp）所说的，由于罗盘的使用，“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被灌注到船上，因此，人与船建立起了一种共同体和亲和性”。如今，最遥远的大洋上的陆地已经彼此联系在了一起，地球终于向世人揭开它的面纱。尽管如此，现代的罗盘却不是诞生于威尼斯，传统上一般认为，在地中海地区，它于1302年问世于一个名叫阿玛尔菲（Amalfi）的意大利滨海城市。威尼斯人与这种新颖的航海工具失之交臂。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现在我想再次重复一下，我无意贬低威尼斯的光荣和声誉。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当一个民族准备选择另外一种元素即海洋作为其全部的历史性生存方式时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海战方式最好地显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何以几乎从没有提到过把人的全部生存从陆地转向海洋这档子事。在古典风格的海战中，由桨作动力的战船彼此互相撞击，试图从侧面撞坏并登上敌人的船只。这种海战始终是一种近距离搏斗。“像成对的摔跤手，战船彼此撕扯成一团。”在发生于米莱（Mylae）的一次海战中，罗马人首先攀上了

敌船，他们的方法是，向敌船抛掷木板，以此搭成一座桥梁，然后徒步登上敌船。这种海战由此变成了在船上进行的陆战。人在船的甲板上用刀剑搏斗时如履平地。这就是古代那些著名的海战所进行的方式。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手制武器，马来人部族和印第安部族却是遵循着同一种原则进行海战的。

采用这种作战方式的最后一次海战、同时也是威尼斯历史上的最后一件光荣业绩，即1571年的莱畔托（Lepanto）海战。在那次战斗中，西班牙和威尼斯舰队与土耳其人遭遇，并赢得了基督徒与穆斯林人海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这次战斗发生在一个叫做阿克提乌姆（Aktium）的地方，公元前30年，在这同一个地方，奥克塔文和安东尼所分别统领的东西方舰队进行过一次遭遇战。而莱畔托海战本质上仍然是以1500年前发生在安提乌姆的那次海战中所使用过的同样的技术手段进行的。西班牙的精锐步兵与奥斯曼帝国的精锐步兵在一场发生在战船甲板上的肉搏战中徒手厮杀起来。

莱畔托海战之后仅仅过了数年即1558年，由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惨败于英国，新的海战方式开始崭露头角。英国人的小帆船与巨型的西班牙国家战舰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然而，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在当时的造船业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1450年至1600年期间，与所有其他民族相比，荷兰人发明了更多的新型舰船。单单新的大陆和海洋的发现本身还不足以解释海权以及对海洋这一生存元素予

以选择的原因。

五

不是堂皇的国家战船上的高贵的执政官，而是野蛮的冒险家和海上漫游者，穿梭于海洋的大胆的捕鲸者，以及勇敢的航海者才是新的海洋性存在的第一批英雄。在捕鲸和造船这两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领域，荷兰人一开始就遥遥领先。

在此，我必须首先为鲸鱼及其捕猎者奉上我的赞辞。如果不提一提富于传奇色彩的利维坦以及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捕鲸人，海洋的伟大历史以及人类对于海洋这一元素的决断就无从谈起。这的确是一个非同一般的题目。我卑微的赞辞怎能与鲸鱼及其捕猎者的功绩相匹配呢？我怎么能以轻松惬意的口吻去讲述这两个海洋上的奇迹呢？一个是所有动物中最为强壮的，一种是所有猎人中最为勇敢的。

我之所以敢碰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可以求助于两位伟大的先行者，即雄辩的法国历史学家尤利斯·米歇莱特（Jules Michelet），以及伟大的美国诗人海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那位法国人1861年发表了一本关于海洋的书，这是一首关于海洋之美及其未知的奇迹世界的赞歌，它歌颂了那些依仗海洋才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大陆的财富，这些大陆还没有被人——“这个世界的残暴的国王”——征服和利用。世界诸大洋之于麦尔维尔就相当于东地中海之于荷马。在一本写于1851年且有着巨大影响力的

小说《白鲸》中，他讲述了一头叫做莫比·迪克的鲸鱼及其捕猎者即船长埃哈伯的故事，这是一部奉献给海洋元素的最伟大的史诗。

当我有时不说鲸而说鲸鱼，有时不说捕鲸者而说捕鲸鱼者时，我心里很清楚，人们会把它看作一种外行的且不准确的表达方式。关于鲸的动物性本质，人们会这样教导我：正如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鲸乃是一种哺乳动物，而不是一种鱼。关于这一点，人们在林奈（Linné）于 1776 年出版的《论自然的体系》中可以读到，比如，鲸鱼是热血动物，通过肺而不是像鱼一样通过鳃呼吸，母鲸产下拥有高度复杂的组织机能的幼崽，并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会充满爱心地哺育和养护幼崽。我根本无意与那些对于鲸有着深不可测的研究的博学之士们——即所谓的鲸学家们——争论，而只想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形下，对以下问题作个简略的说明，即我为什么没有完全回避鲸“鱼”这个陈旧的名字。鲸鱼当然不像鲱鱼和梭子鱼那样是一种鱼。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将这种稀有的怪物称为一种鱼，其目的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事实，即这种热血巨怪被交付给海洋这种元素，而其生理组织却并非是为了这种元素而配置的。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相反的例子吧：一种用鳃呼吸的巨大的生物竟然在坚实的陆地上乱跑一气！那种从北极到南极游遍了世界的各个大洋的体积最大、体格最强壮且最有力量的海洋动物，竟然用鳃呼吸，且将其作为哺乳动物的活蹦乱跳的幼崽放入海洋世界中！它也不是两栖动物，而是真正的哺乳动物，于此同时，根据其生命元素它还是一种鱼。在我们所关注的 16 至 19 世纪的这段时间里，这种巨鲸的捕猎者乃是真正具有大家风范的捕猎者，而不仅仅是“猎手”。这一点对我们的论题不是没有意义的。米歇莱特，这位对鲸情有独钟的法国人，在其关于海洋的书中以特别感人的笔调描写了鲸鱼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雄性鲸鱼是雌性鲸鱼的最具骑士风度的情人和最温柔的配偶，同时也是最体贴的父亲。它比其他所有的动物更人道，甚至比那些采用野蛮的恐怖消灭它的人也更人道。然而，当 1861 年米歇莱特写这本书时，当时的捕鲸手段还是如此的无害，虽然当时的汽船和火炮已经制造了更多的武器，且使那些可怜的鲸鱼成为更容易遭受攻击的目标。当米歇莱特看到今天由工业促成的鲸油提取业以及鲸鱼尸体加工业时，这位动物界和人类的朋友该会作何评论呢？因为人们已经不能把一战（1914—1918）后产生并愈益完善的“海洋”捕捞业称为猎，更不能将其叫做捉了。如今，重达 30000 吨的巨型捕捞船，配备着电力机器、火炮、榴弹炮、飞机和无线电装置，像一个游动着的厨房航行在南极的雪海中。在那里，鲸企图躲藏起来，也正是在那里，它们被就地在船上予以工业加工。就这样，这些可怜的鲸鱼几乎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殆尽了。1937 年和 1938 年，在伦敦终于达成了一个国际公约，对捕鲸作了某些规定，划定了捕鲸区，还有其他类似的规定，通过这一举措，至少希望那些仍然存活下来的鲸能够免于被继续无计划地猎杀。相比之下，我们提到的那些捕鲸者乃是真正的猎手，而不仅仅是渔

民，更不是像机器一般的屠鲸者。他们从北海或者大西洋海滨出发，借助帆船和船桨，穿过各大洋的惊涛骇浪，追逐着他们的猎物，他们用来与那些海洋上的强壮而狡猾的庞然大物搏斗的武器是一种人力投掷的标枪。这是一场发生在两种动物之间的有生命危险的搏斗，他们在动物学意义上并不是鱼，却在海洋这一元素中运动着。那时，在这种搏斗中人所使用的所有的辅助性工具还只是由人的肌肉控制的东西：帆，桨，还有那种致命的投掷物，标枪。鲸是如此地强壮，足以用他的尾巴将船只击碎。它会用千百种诡计与人周旋。海尔曼·麦尔维尔，他本人曾经很多年作为水手在一个捕鲸船上工作过，在他的《白鲸》中描写了发生在捕猎者及其猎物之间的一种个体关系，以及一种内在的、敌友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形成的。通过与海洋中的另外一种动物的斗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海洋性存在的原始深渊中。

这些猎鲸人从地球的北部航行到南部，从南极洲航行到太平洋。永远跟随着鲸鱼们的神秘踪迹，这些捕猎者发现了很多岛屿和大陆，但并没有大肆渲染此事。当麦尔维尔书中的一个航海家读了澳大利亚的发现者库克船长的书以后，这样说道：这位库克在书中写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一个捕鲸人的日记中是不大会出现的。米歇莱特曾经问过，谁为人类开启了海洋的门户？谁发现了海洋的区划和航线？一言以蔽之：谁发现了地球？鲸和捕鲸人！这一切都与哥伦布和那些最著名的淘金者无关，他们只是以巨大的喧闹声发现了那些来自北部地区以及布列塔尼和巴斯克地区的捕鱼民族早已

发现了的东西。米歇莱特继续评论道：这些捕鲸人才是人类勇气的最高贵的代表。如果没有鲸鱼，这些渔民恐怕永远会在海岸流连往返。是鲸将他们引向海洋，并从海岸解放出来。人类借助鲸鱼发现了洋流和北部的航线。是鲸引领着我们。

16 世纪时，在我们的星球上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猎人。这两种人都打开了崭新的、无限的空间，大量的财富从中涌现出来。在陆地上，俄国的毛皮兽猎人在毛皮兽的引领下占领了西伯利亚，并经由陆路到达了亚洲东部海滨；在海洋上，这些北欧和西欧的捕鲸人在捕猎过程中穿越了世界各大洋，正像米歇莱特正确地所说的那样，他们使整个地球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他们乃是一种崭新的、源初性存在的头生子，最早的、真正的“海的儿女”。

六

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出现在这一转折时期。此时荷兰人仍然处于领先地位。1600 年左右，在造船业领域他们是无可争议的领航者。他们发明了新的船帆技术和新的帆船类型，这些发明取代了船桨，并且使得那种与新发现的大洋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成为可能。

1595 年，从一个位于荷兰北部西伏里斯省的城市霍恩出发，一种新型的舰船起航了，它配置着直角帆，这种帆不像老式的帆那样只能在顺风下行驶，而是在风侧着吹过来时也

能行驶，与传统的帆相比，这种帆懂得利用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如今，帆具和航行的艺术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完善着。关于这一发明，一位名叫本哈特·哈格敦的船舶发展史史家，这样评论道：“中世纪的航海灾难性地崩溃了。”在陆地与海洋的关系史上，此时此刻才是真正的转折点。大体而言，就当时那些可以用来制造帆、船的材料而言，造船技术已经不可能再有所突破了。直到 19 世纪，造船技术领域中一场新的革命才开始出现。哈格敦认为：“对航海家而言，当他们拆掉巨型的船帆，发现他们用小型船帆就能从事一切航海活动时，这简直像一个启示。”借助这项技术成就，荷兰人成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搬运工”。他们也成了德国汉莎贸易的继承者。尤其是，当时的强国西班牙为了能够保持其海外运输的通畅，也要租用荷兰人的船只。

此外，16 世纪时诞生了一种新的战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一种装备着火炮的帆船在其船舷上配备着加农炮，从船舷向敌人发射成排的火炮。这样以来，海战就成了在远距离进行的以高度的航海技术统领的炮兵战斗。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可以谈论海战，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橹舰上的海员之间的战斗则只是在船上进行的陆战。一种全新的海战战术和一种全新的海战实践结合起来了，这是一种崭新的、高级的“演化”技巧，在海战前、海战中以及海战后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本在现代意义上论述这种新战术的科学书籍出自一个法国人，耶稣会神甫保罗·霍斯特（Paul Hoste），1697 年这本冠以“海军的艺术或论海军的演化”之名的书在

里昂出版。它以批判的方法研究了在路易十四发动的反对荷兰的战争期间，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海战及其海洋战略。其他法国著作接踵而至。直到 18 世纪也就是 1782 年，一位名叫埃尔丁的克勒克（Clerk d'Eldin）的英国人才跨入最著名的海军战略家的行列。

所有西欧和中欧的民族都参与了地理大发现这一集体成就，这使欧洲统治了整个世界。意大利人完善了罗盘，并绘制了海图；美洲的发现首先要感谢托斯卡那人以及哥伦布的学识和天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首先进行了伟大的发现之旅，并环游了地球。伟大的德国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图景也做出了贡献；宇宙志研究者瓦尔策穆勒（Waltzemueller）于 1507 年发明了“美洲”这个名称，其在委内瑞拉的捕鲸探险是一项伟大的殖民举措，但仍然无法与西班牙的抵制相抗衡。在捕鲸业和造船技术方面，荷兰人处于领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尤其拥有巨大的可能性，因为法国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即地中海，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而且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其大西洋沿岸居民有着天生的航海意识。正是一位名叫让·佛雷（Jean Fleury）的法国维京人于 1522 年率先对西班牙的世界霸权给予沉重一击，夺走两艘装满财宝的船只，它们是科梯茨（Cortez）从美洲运往西班牙的；另一位名叫让·卡提尔（Jean Cartier）的法国探险家在 1540 年已经发现了加拿大，被称为“新法兰西”，而且以法国国王的名义予以占领。胡格诺教派的海盗从拉罗切拉蜂拥而至，在这场突然爆发的海上探险热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天才的海军大臣科贝特（Colbert）的

领导下，法国在17世纪时在战舰制造业方面还曾经领先过英国人数十载。

毋庸置疑的是，英国人的航海成就同样是毫不逊色的。然而，只是在1570年以后，英国的航海家才向南越过了赤道。只是从16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英国海盗才争先恐后地开始了对海洋和美洲的争夺。

七

形形色色的海上漫游者，如海盗，从事海上贸易的冒险家，与捕鲸者和航海家们一起构成了转向海洋的先头部队，这个过程在16和17世纪才告结束。由此，我们拥有了另外一种更为大胆的“海的儿女”。他们之中有许多著名人物是海洋和海盗史上的英雄，如佛兰茨·德雷克，霍金斯，瓦尔特·拉莱爵士，或者亨利·摩根爵士等，在许多书中他们都是广为传颂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冒险性。他们掠夺了西班牙船只上的银器，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主题。总体来说，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海盗的文献，尤其是，其中也有许多伟大的人物，英国人甚至编写了一本关于海盗的辞典，一本海盗名录，并冠以“海盗大全”这一书名。

所有这些粗犷的海盗在历史上还是赢得了实实在在的声誉，因为他们使西班牙的霸权和西班牙的商业垄断遭受了最早的打击。在法国的海上要塞拉罗切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胡格诺派海盗和荷兰的“海狼”一起与西班牙进

行了战斗。然后，所谓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中又立下了汗马功劳。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之后，还有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海盗，其中的亨利·梅恩沃宁爵士，起先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后于1616年被国王赦免，最终成为了一个身负责任和荣誉、与海盗为敌的杰出的斗士。然后是来自中、南美洲地区的海盗，有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他们从牙买加和加勒比海展开大规模攻击，其中的亨利·摩根爵士于1671年劫掠了巴拿马，被国王查理二世擢升为骑士阶层，并荣任王室在牙买加的总督。1697年，在法国皇家舰队的协助下，他们攻占了西班牙在哥伦比亚的海上要塞卡塔根那，当法国人撤走后，他们以可怕的方式对这个要塞予以蹂躏，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英雄壮举。

海洋这一元素借助这些海上漫游者破土而出。他们的英雄般的时代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即大约从1550年持续到1713年，也就是从新教势力开始与西班牙天主教世界霸权进行抗争到乌特勒支和约签定为止。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海洋上都存在着海盗。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几千年前被克里特帝国驱逐出东地中海的海盗开始，一直到1920年和1930年代仍然在东亚海域袭击和劫掠商船的中国海盗为止。尽管如此，16和17世纪的海盗却代表着海盗史上的特殊一页。直到1713年签定乌特勒支和约时，海盗的历史才告一段落，因为直到那时欧洲的国家体系才稳固下来。此时，诸海权国家的战舰刚刚能够对海洋进行真正的统治，一

个新兴的建立在海洋基础上的世界霸权即英国则开始显山露水。尽管如此，一直到19世纪，仍然存在着私人的、经政府授权而进行战争的海盗。然而，世界的自我组织体系不断进步，造船技术和航海在不断自我完善，且日益科学化，海盗业已经成了——正如一位英国海军专家所说——一种“海洋上的前科学阶段的战争方式”。自食其力的海盗现在成了悲惨的违法者。当然啦，总是有一些例外。法国一个名叫米松的船长就是其中之一。1720年左右，他在马达加斯加试图建立一个独特的人类王国。一般来说，乌特勒支和约以后，海盗在世界历史上已经被抛至最边缘的地位。18世纪时，在人们眼里，他们成了一种粗野的动物，一种最野蛮的罪犯。虽然如此，他们有时却能成为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如斯蒂文森的小说《珍宝岛》（*Schatzinsel*），但在历史上，他们已没有任何地位。

相比之下，16和17世纪时的海盗却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积极的战斗者，他们参加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所进行的伟大的世界性对抗。当他们被抓获时，他们的敌人西班牙人把他们当作普通的罪犯和杀人强盗而将其绞死。当他们成为一个包袱或外交上需要时，即使他们自己的政府也对他们冷眼相待。通常而言，一个海盗是坐拥皇家尊严终老于庙堂之上，还是作为一个被处绞刑的海盗而悬于绞架，这实在是一个偶然。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诸如海盗（Pirat，Korsar）、私掠船船员（Privateers）和商人—探险家的不同称谓就被混淆着使用。从法律的层面看，Piraten与Korsaren之间

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因为与称作Piraten的海盗不同，那些称作Korsaren的海盗拥有政府授权的法律权利，即国王正式颁授的文书。他可以悬挂本国的旗帜。而称为Piraten的海盗，他们的航海却没有经过政府的法律授权。他们只能悬挂黑色的海盗旗。然而，这种区分在理论上尽管如此优雅和清晰，但在实践上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拥有法律授权的海盗（Korsaren）经常超越他们的权限，凭借假文书行驶，有时甚至以一个子虚乌有的政府的书面授权的名义行驶。

与这些法律问题相比，另外一些事情有着更为本质的意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海盗们都有一个政治上的敌人，那就是西班牙的天主教霸权。只要他们忠实于自己，原则上他们将只劫掠天主教的船只，而且把这一行动看作受上帝保佑和祝福的功业。因此，他们处于一个宏伟历史的最前线，即处于当时的新教势力反抗当时的天主教势力的最前线。他们杀过人，放过火，抢过东西，这一点无须予以美化。然而，在这个转折期间的总体趋势中，他们毕竟拥有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在历史上获得了意义和声誉。

八

英国国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和当时的政治家们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有着同样的世界历史意识。他们制定自己的政策，利用各种到手的机会，攫取种种好处，千方百计维持其地

位。如果法律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运用法律，当法律对其对手有利时，他们就坚决反对对手们的过错。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关于上帝、世界以及法律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动荡不安的世界历史的观念并不比其他欧洲国家中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多数政治家们更为现代，但天才的托马斯·莫尔、沃尔西大主教或者佛朗西斯·培根应该除外。

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海上霸权的伟大奠基人，她也无愧于这一名声。她发动了与天主教世界霸权西班牙的斗争。在其任内，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击败（1588 年）；她尊重和支持像佛兰茨·德雷克以及沃尔特·拉莱这样的海上英雄的事业；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后来为英国夺得了整个印度——正是在她治下于 1600 年左右获得了贸易特权。在她统治的 45 年（1558—1603）里，英国成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富庶国家。从前，英国人从事养羊业，把羊毛卖到佛兰德地区；如今，英国海盗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利品从各个大洋会聚英吉利岛。伊丽莎白女王喜爱这些财宝，并由此而富裕起来。在这一点上，这位女王表现得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或高贵或低贱的英国男女并无两样。他们几乎都参与到了这种劫掠行动中。当时，成百上千的英国男人和女人变成了海盗资本家。这同样从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从陆地到海洋的根本转型过程。

来自康沃的吉利格鲁家族就是这种早期海盗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典型代表。与许多官方文献以及以官方风格撰写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律文书相比，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世界观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当时占据领导阶层的、真正的“精英”的画像，它们更生动，也更实在。与那些外交家、法学家和桂冠诗人相比，这个家族以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了他们的时代特征。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家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今在英国的国家传记辞典中，吉利格鲁这个名字出现过十多次。因此，我们还是在这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家族这里逗留一些时间吧。

这个家族来自康沃的阿维奈克，位于英国的西南部。伊丽莎白时代，其族长为约翰·吉利格鲁，康沃地区的舰队副司令，兼潘德尼斯要塞的世袭皇家总督。他与女王的首席大臣威廉·赛西尔，亦即布莱勋爵密切配合。这位舰队副司令的父亲和叔叔曾经是海盗，而且根据英国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可靠的资料，甚至他的母亲也反对一项对海盗不利的诉讼程序的通过。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分布在英格兰沿海地区，另一部分在爱尔兰，很多堂亲戚和更远的亲戚则分布在达封和多塞特的滨海地区。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和同伙。他们专事袭击和抢劫，主要劫掠那些靠近他们海岸的船只，监督战利品的分配，卖掉分得的份额、职位和官衔。吉利格鲁家族所居住的宽敞的宅院正好位于法尔毛斯港的一个幽闭的所在，有一个秘密通道通往大海。坐落在附近的唯一的建筑物就是刚才提到的潘德尼斯要塞，皇家总督的所在地。这里配备有十门加农炮，在紧急时刻用作海盗们的避难所。高贵的吉利格鲁夫人在成为她丈夫的令人羡慕且成就斐然的伙伴之前，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一位广受尊敬

的"海盗先生"。她在家里给海盗们以庇护，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这个地区的所有港口都设置了小客栈和避难所。

吉利格鲁家族的活动很少受到王室的干扰，而且从没有被阻止过。唯一的一次干扰发生于1582年，关于这件事我还想粗略地讲一下。一艘144吨重的汉莎同盟的船只——它属于两个西班牙人——由于风暴被迫驶入法尔毛斯港。由于当时英国与西班牙处于停战状态，西班牙人不假思索地直接把船停泊在阿维奈克的家门口。吉利格鲁夫人透过她的窗户观察着这只船的动向，她立刻颇有经验地意识到，船上装有值钱的荷兰布匹。1582年1月7日的晚上，全副武装的吉利格鲁家族突然袭击了这艘可怜的船只，而吉利格鲁夫人本人则身先士卒，他们杀死了船员，将尸体抛入海中，然后满载值钱的荷兰布匹和其他战利品返回阿维奈克。那只船却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消失在爱尔兰。幸运的是，船的主人，即那两个西班牙人当时并不在船上，因为他们在陆地上的一个小旅馆里过夜。他们向设在康沃的主管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经过一番调查，法庭认定了如下事实，那艘船很可能是被一些不知名的案犯偷走的，除此之外，案情就无法解释了。这两个西班牙人碰巧在政界有一些关系，他们成功地将这个案子提交给了伦敦的最高当局，于是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吉利格鲁夫人及其同伙被提交给异地法庭受审，她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她的两个同伙被处决，而她本人则在最后一刻被赦免。

这就是有关吉利格鲁夫人的真实故事。伊丽莎白女王治

下的40年里，英国舰、船的绝大部分从事劫掠和非法生意，从事合法贸易的船只总共不超过50000个吨位。吉利格鲁家族乃是这个伟大的海盗时代的大后方的典型个案。这应验了13世纪的一个古老的英国预言："狮子的儿女将变成海中的鱼。"中世纪结束时，狮子的后代开始养起了羊，而羊毛则在福兰德加工成了布匹。从16和17世纪开始，这个民族才真正从牧羊人变成了海上漫游者和海盗，也就是"海的儿女"。

九

英国人的航海业绩来得相当晚近和迟缓。在他们之前，葡萄牙人已经在世界上航行了100多年，虽然大多是沿着海岸行驶。1492年后，伴随着对美洲的占领，西班牙人迎头赶上。法国航海家，胡格诺派分子以及英国人则紧随其后。然而，只是在1553年，随着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的建立，英国才开始其海外殖民的政策，并借此开始与其他殖民势力并驾齐驱。如刚才所说的，直至1570年以后英国人才驶过赤道以南。第一份切实的可以证明英国开始建立其新的全球视野的文献是哈克鲁伊（Hakluyt）的书，《主要的航海活动》，它于1589年出版。在捕鲸和造船方面，荷兰人仍然是英国人的老师，正如他们也是其他民族的老师一样。

尽管如此，最终还是英国人超过了所有的国家，战胜了

所有的对手，夺取了一个建立在海权基础之上的世界霸权。英国成为了继承者。它继承了所有其他欧洲民族那些卓越的海上捕猎者、航海家、科学家以及探险家们的成就。德国、荷兰、挪威和丹麦航海家们在海洋上所取得的业绩和壮举，最终成就了英国对于这个世界性的海上霸权。虽然欧洲其他民族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仍旧存续着。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攫取了巨额的海外财产，但他们丧失了对海洋的统治以及海上的交通线。当克伦威尔于 1655 年占领并控制牙买加时，英国关于世界诸大洋的总体政治构想以及对于西班牙的海外优势已经变得相当明晰了。1600 年左右，荷兰在海上的业绩尚处于鼎盛时期，100 年后即 1700 年时，荷兰已经严重地陆地化了。它被迫在陆地上抵御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进攻，为此必须修筑坚固的陆上防御工事；他们的总督，奥尔良的威廉三世 1689 年同时成为英国的国王；他移居于那个海岛之上，为英国政治服务，而不再为荷兰政治效力。法国没有将胡格诺新教徒所掀起的对于海洋的巨大冲动保持下去。与其精神传统相一致，法国最终还是站在了罗马的一边，而且伴随着 1572 年的巴托罗谬之夜的大屠杀以及亨利四世的天主教改宗，法国选择了反对胡格诺教派、维护天主教利益的政策，由此，最终还是选择了陆地而不是海洋。当然，法国的海军实力相当强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路易十四时仍能与英国相对抗。然而，自从 1672 年法国国王将其贸易兼海军大臣科贝特解职以后，对陆地的决断就已不可逆转了。18 世纪漫长的殖民斗争只是印证了这一事实。德国的份额则在

宗教战争以及当时不幸的帝国政治中丧失殆尽。

如此以来，英国就成了继承者，欧洲民族的大觉醒的唯一继承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问题无法借助与早先历史上的海权个案进行笼统的比较予以解释，也无法与雅典、迦太基、罗马、拜占廷相类比。归根结底，这里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其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在于，英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刻、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根本的变革，即将自己的存在真正地从陆地转向了海洋这一元素。由此，它不仅赢得了许多海战和陆战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远不至这些，也就是说，还赢得了一场革命，一场宏大的革命，即一场行星的空间革命。

十

什么叫空间革命？

人有一种空间意识，这种意识受制于巨大的历史变动。不同的空间对应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时间里，对于日常生活实践而言，每个人的空间意识都受制于各自不同的职业。大都市里的居民对世界的看法与农民不会雷同；捕鲸人的生活空间与歌剧演员也截然不同；在飞行员的眼里，世界和生活不仅呈现出另一种样子，而且具有另外一种维度、深度和视野。当事关不同的民族和人类历史的不同时代时，空间意识的差异就更深且巨了。

科学的空间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有时几乎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在很多个世纪中，那些为数不多的认为地球是圆形的学者，曾经被认为是精神病人和害群之马。在现代社会里，伴随着日益增加的专业化趋势，不同的科学门类都产生了不同的空间概念。几何学，物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分别走着日益疏远和专门的路径。如果你向这些学者们讨教其中之原委，他们会这样回答你，数学上的空间与电磁学意义上的力场不是一回事，而电磁学上的力场又和心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空间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半打关于空间的概念。故此，空间概念已不存在任何统一性，而且有这么一种危险，即重要的问题被各种彼此没有关联的概念消解掉了。即便是 19 世纪的哲学和认识论也没有提供一个宏观的、简明的答案，这使得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变得无所适从。

但是，历史的动力和力量并不傻等着科学的光临方才启动，正如哥伦布并不需要等候哥白尼才能远航。每当历史的力量由于某种新的突破而进入到人类总体意识的范围里，每当新的国家和海洋由于某种新能量的释放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历史存在的各种空间也会相应地改变自身。这就形成了政治—历史行动中的新尺度、新维度、新经济、新秩序，以及一个崭新民族或再生民族的新生命。这种拓展是如此的深刻和迅猛，以至于它不仅改变了某些尺度和标准以及人的眼界，而且也改变了空间概念本身。人们这才能够谈论空间革命。然而，通常的情形是，某种空间图景的改变与那种历史的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那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全面变革的真正核心。

借助以下三个历史事例，我们能够很快地说清楚这个一般事实：即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 1 世纪时的罗马帝国、以及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发展的影响。

十一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为希腊人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且前所未有的空间视野。其遗产就是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和艺术。亚里士多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一空间巨变的同代人，已经意识到，这个由人类居住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撒摩斯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他的生活年代稍微靠后一点（公元前 310－230 年），已经做了这样的猜测，太阳可能是一颗恒星，它可能处于地球轨道的中心。亚历山大里亚，这个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位于尼罗河畔的城市，成了技术、数学和物理学领域中的令人惊叹的发现和发明的中心。欧几里德，这位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奠基人，就在这里任教；海罗（Hero）在这里进行了令人吃惊的技术发明。叙拉古的阿基米德，这位伟大的战争机器的发明者和自然科学规律的发现者，也在这里教书。埃拉色托尼（Eratosthenes，公元前 275—195 年），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已经先于后来的哥白尼准确地计算出了赤道的长度，并在理论上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状体。尽管如此，希腊人的世界还不足以宏阔到能够引发一场行星的空间革命的地步。关于它的知识还停

留在学术层面，因为它还没有把世界诸大洋纳入其生存的现实中。300年后，当恺撒从罗马攻占高卢和不列颠，欧洲西北部豁然洞开，大西洋伸手可及。这是迈向今日所谓的“欧洲”这--空间意识的第一步。罗马帝制时期的头100年里，尤其是尼禄时代，一种深刻的变革意识是如此的强烈和紧迫，人们、至少是那些举足轻重的精英们，已经几乎可以谈论关于空间革命的变革了。这一历史时刻与我们所采用的纪元方式中的头100年相吻合，故此值得我们给予特别关注。此时，视野已经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全面拓展。对外征略和内战已经打乱了从西班牙到波斯、从不列颠到埃及的空间秩序。相距遥远的地区和民族开始有了联系，并感受到了某种共同的政治命运的统一性。帝国的各个角落，无论是日尔曼还是叙利亚，无论是非洲还是伊利里亚，一个将军能够被其士兵拥戴为罗马的皇帝。科林斯地峡被突破，阿拉伯人在南部绕道而行。尼禄派遣的一支远征队抵达尼罗河源头。阿格里帕的世界地图以及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乃是这一空间拓展的明证。从此，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这档子事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几个天文学家或数学家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塞内卡，尼禄的老师、最终也是其牺牲品，以卓越的诗行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空间感。他明确地说道，借助顺风也就是东风，人从西班牙的最远端的海岸只需航行数天，就可以沿着朝向西方的航道到达东方的印度。在其悲剧《美狄亚》中的另外一个段落，他以优美的诗句表达了一个奇特的预言：

> 酷热的印度河与寒冷的阿拉克斯河相交汇；
> 波斯人饮用易北河和莱茵河的水。
> 忒提斯（Thetis）将揭开新世界（*novos orbes*）的面纱，
> 图尔（Thule）将不再是大地的边界。

我之所以引述这些诗句，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一种宏大的空间感，这种感觉在公元1世纪时乃是活生生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与其维系在一起的不仅是这个时代的富足和充裕，也有开阔充盈的空间和视野。塞内卡的话搭起了一个通向现代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神秘的桥梁，因为它们越过了几个世纪中的空间盲点以及欧洲中世纪的陆地化。它们向深思之士传达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世界的感觉，甚至为发现美洲也助了一臂之力。像许多同代人那样，哥伦布知道塞内卡的话，而且在这些话中找到了探索新世界以及大胆远航的动力和勇气，在这一航行中，他从西方起航，试图到达东方，事实上他真的做到了。塞内卡所使用的“新世界”（*novos orbes*）这一称谓，1492年时立刻被用来称呼刚发现的美洲。

罗马帝国的衰落，穆斯林的扩张以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导致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空间上的盲点和欧洲的陆地化。从海洋上被排挤出去，缺乏海军，彻底地领地化，这是早期中世纪及其封建体制的典型特征。从公元500年至1100年，欧洲变成了一个封建的、农业的领地聚合体，其统治阶

层即封建领主，将精神性文化、甚至读书和写作的差使交给了教会和僧侣。这个时代的那些大名鼎鼎的统治者和枭雄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为此，他们需要僧侣或家庭神甫。在一个海洋性帝国中，统治者似乎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无知无识的状态，像那种以纯粹领地和农业经济为中心的陆地权力复合体的状态下所经常有的情形那样。只是由于十字军东征的缘故，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骑士和商人才知道了近东地区。在北部，德意志汉莎同盟和条顿骑士团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这里形成了一套运输和贸易网络，被称为“中世纪的世界经济”。

此外，这种空间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变革。整个欧洲都在产生一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在法国、英国和西西里出现了一套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现代国家的来临。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区，生长出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伴随着一种新的神学和法学，大学开始发展起来，罗马法的复兴产生了一个新的受教育阶层，即法学家阶层，并打破了那种在中世纪时代司空见惯的教会僧侣们对教育的垄断。在那种新的哥特式艺术中，在建筑、雕塑和绘画中，一种有力的动感节奏克服了古代罗马艺术的静止空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富于动感的力场，一种动感的空间。哥特式穹隆是这样一种构造，其中的各个部件借助其重力作用，互相支撑，以保持平衡。与那种静止的、凝重的罗马式建筑式样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感。然而，即使与古代庙宇以及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相比，在这种哥特式艺术中也显示出了其特有的改变空间的力量和动感。

十二

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历史事例，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在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图景的变革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它发生在 16、17 世纪，在这些世纪里，人们发现了美洲，进行了首次环球远航。一个新世界——在这个词汇的最大胆的意义上——应运而生了，首先是西欧和中欧各民族的整体意识，最后是人类的整体意识，在根本上予以改变了。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革命，它全面彻底，包罗万象。

其他任何空间变革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它与其说是地理范围上的单纯数量上的扩展，比如说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还不如说是由于清除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些传统观念，人类的整体意识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们对于这个星球的整体看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宇宙的天文学上的整体观念。在人类历史上，人第一次像把一个球体攥在手里一样了解了这个地球的实景和全貌。地球可能是一个球状体，这个想法对于中世纪时代的人、甚至对于马丁·路德来说，都似乎是一个可笑的、不必认真理会的天方夜谭。如今，地球乃是一个球体这个想法，已经是一个明确的事实，一个不可辩驳的经验，还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科学真理。现在，就连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恒星的地球也开始绕着太阳运转了。然而，即

便这一点也还不是已经发生了的真正的、最深刻的空间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向宇宙的拓展，以及对于一个无限虚空的认识。

哥白尼第一次以科学的方式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他的关于天体运转轨道的作品《天体运行论》于 1543 年问世。由此，他虽然改变了我们的太阳系，但他却仍然坚持认为，作为世界整体的宇宙乃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在大宇宙这个意义上，世界乃至空间的概念本身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几十年后，这个界限被打破了。在乔丹诺·布鲁诺的哲学体系中，太阳系——作为一颗行星的地球在里面绕着太阳运转——只是无限的星空中的许多星系中的一个星系。由于伽利略的科学实验，这些哲学思辨变成了可以被数学证明的真理。开普勒计算出了行星的轨道，虽然当他想到以下情形时就不寒而栗，漫无涯际的空间，无数星系运转于其中，没有一个边界，也没有一个中心。由于牛顿的理论，这一崭新的空间理论才终于在已经开化了的整个欧洲站稳脚跟。根据万有引力定理，在无限的虚空中，借助引力和斥力的平衡作用，天体和物体产生了运动。

如此以来，人们可以设想一种虚空了，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尽管一些哲学家曾经谈论过“虚空”这个问题。从前，人们害怕所谓的虚空这种东西。现在他们忘记了这种恐惧，而且，对于他们生存于虚空中这一事实终于不再恐惧了。18 世纪的启蒙作家们——其中以伏尔泰为其翘楚——甚至以能够认识这样一个可被科学证明的无限虚空的世界而自豪。然而，还是请你切实地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虚空吧！一个不仅没有空气、而且连最纤细和微小的物质也不存在的虚空！在想象中再尝试着将空间和物质彼此区分开来，并想象一下只有一方存在、而另一方不存在时的情形吧！你只能想到一个绝对的虚无。那些启蒙者们极力嘲笑那种在虚空面前的恐惧感。然而，这或许只是对虚无和死亡的虚无性、虚无主义的观念和虚无主义本身心领神会地耸耸肩膀而已。

这些变革——隐含在无限虚空这一观念里——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单纯的已知世界的地理扩展的结果。这一变革是如此根本和具有革命性，以至于人们也可以把话这样倒过来说，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只不过是某种深层变革的表现方式。只有这样，在一个未知的荒岛登陆才能带来一个地理大发现的完整时代。人们经常会从西方或从东方出发在美洲登陆。众所周知，维京人大约在公元 1000 年时已经从格陵兰出发在北美洲登陆，而哥伦布发现的印第安人也一定是从某个地方来到美洲的。然而，尽管如此，美洲还是 1492 年后被哥伦布“发现”的。“前哥伦布时代”的种种发现既没有引发行星的空间革命，也不是这一革命的结果。否则，阿兹台克人就不会留在墨西哥，而印加人也不会留在秘鲁了；某一天他们将会手拿世界地图来拜访我们，反过来发现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发现他们了。空间革命不仅仅意味着在某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地方登陆。它意味着空间概念在人类存在的各个阶段和领域的变革。16、17 世纪这一历史上

的转折点见证了空间革命的真正含义。

在这个转折时代的数百年里，欧洲人同时在其创造性精神的所有领域达成了新的空间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取代了中世纪哥特式绘画的空间；如今画家把他所描画的人和物置于一个空间中，从透视法的角度看，这个空间显示为一个虚空的深度。如今，人和物乃是在一个空间里存在和运动了。与哥特式绘画的空间相比，事实上这意味着另外一种空间。如今，画家以不同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他们的视角发生了改变，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伟大的画家不仅仅是那些能够把漂亮的东西描画出来的人。艺术乃是空间意识的历史刻度，而且，与其他人相比，真正的画家能够更好、更准确地观察人和物，尤其是，在对其自身时代的历史性真实的表现方面将更为准确。然而，这种新的空间感不仅出现在绘画领域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学创造了与哥特式空间大异其趣的古典的、几何学结构的建筑，这个时期的雕塑把人物的雕像安置于一个自由的空间里，而中世纪的雕像则被“钉”在廊柱上和墙壁上。巴洛克时期的建筑重又陷入一种富于活力的运动之中，这在某些方面与哥特式建筑颇为相似，然而，它还是从属于这一诞生于空间革命、其自身也决定性地助过一臂之力的崭新的现代空间。音乐上突破了古代时候关于旋律和节奏的限制，并将其置于我们所说的复调性体系的听觉空间中。在戏剧和歌剧中，演员在空旷的舞台空间里活动，这个空间借助帷幕与观众隔离开。由此，发生于这两个世纪中的全部精神思潮，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以及巴洛克，都为这一空间革命的总体性作出了贡献。

因此，下面一种说法毫不夸张：所有的生活领域，所有的存在方式，所有人类创造力的形式，艺术，科学，技术，都参与了这个新的空间概念的塑造。地理图景的巨变只是某种深层变革的表象，这个变革已经隐含在比如“空间革命”这一意义深远的语汇中。人们所谓的欧洲人的理性优势，欧洲人的精神，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如今已经畅通无阻，大行其道了。它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摧毁了中世纪的社团组织，建立了新的国家、海军和陆军，发明了新的机器，征服了欧洲以外的民族，并将它们扔在这样一种困境中，要么接受欧洲文明，要么屈尊为其附庸。

十三

任何一种基本秩序都是一种空间秩序。人们把一个国家或大陆的宪法称为基本秩序，它的法（*Nomos*）。真正的、源初意义上的基本秩序本质上建立在某种明确的空间界限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某种标准和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阶段，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掠夺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图景的重要改变都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新的领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夺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如此令人瞠目结舌、史无前例的空间革命，就像发

生于16、17世纪的这次空间革命那样，必然导致同样令人瞠目结舌、史无前例的土地掠夺。当时一个崭新的、似乎是无限的空间展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他们争先恐后地向那些遥远的地方蜂拥而去，把那些被他们发现的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的国家和民族当作无主之物，认为它们应该从属于他们这帮第一批欧洲掠夺者。无论是信仰天主教的掠夺者还是信仰新教的掠夺者，都以传播其基督教信仰为天职。他们本来是不需要通过掠夺和抢劫也能传播其信仰的。然而，他们实在是没有其他可以为自己开解的理由和说辞。一些僧侣以令人吃惊的开放态度为印第安人的权利作辩护，比如，西班牙神学家佛郎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在其关于印第安人的演讲（《论印第安人》，1532）中声称，这些民族对于他们的土地的权利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没有关系的。但这无法改变欧洲人掠夺土地的历史风潮。后来，在18、19世纪，从传播基督教信仰这一使命中又增加了在野蛮民族中传播欧洲文明的使命。从这种合法性论证中诞生了一种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所有文明的欧洲基督教诸民族的共同体。这组成了一个“各民族的大家庭”，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秩序。它们的国际法建立在基督教民族和非基督教民族这个区分之上，或者说，100年后，建立在（以基督教欧洲为标准）文明民族和非文明民族这样的区分之上。如果一个民族与这种文明标准不符合，它就不能成为这个国际法共同体的一员；它不是国际法的主体，而只是国际法的客体，也就是说，作为殖民地或殖民性的被保护国，它从属于这些文明民族中的其中一个民族的财产。

当然啦，你也不要把“基督教—欧洲诸民族的共同体”想象为一群和平的小羊羔。他们彼此之间进行血腥的战争。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抹杀存在着一个基督教—欧洲文明共同体和秩序的历史事实。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争夺土地的历史，在每一次对土地的争夺中，争夺者不仅致力于和解，也经常发生争端，更有甚者，经常是血腥地兄弟相残。尽管这样，当面对土地的原始主人以及第三者时，这些掠夺者就有了共同的事业。众所周知，内部争斗，兄弟相残，以及内战乃是所有战争中最灭绝人性的。这尤其适用于那些对土地的共同争夺行动。战争进行得越惨烈，他们争夺的东西变得越有价值。这关系着对新世界的土地的掠夺。16世纪时，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比如在佛罗里达，以残忍的方式彼此进行过多年的屠杀，就连妇女和孩子都不放过。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彼此进行了100年的激烈战争，在战争中，其野蛮的敌意似乎达到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们毫不愧疚地将欧洲以外的人，穆斯林人或印第安人，作为公开的或秘密的帮手、或者干脆作为盟友投入到厮杀当中。这种敌意的爆发是令人恐怖的；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杀人犯，强盗，强奸犯，海盗等等。只缺少一项指责，而这项指责通常是奉送给印第安人的；他们不指责欧洲人自身为食人番。除此之外，各种充斥着愤恨、恶毒的语汇无一缺失。然而，所有的这些指责在如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事实面前都戛然而止了：欧洲人共同瓜

分了新世界。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的意义与本质、及其根本秩序正是瓜分新发现的世界。欧洲人之间无须进行艰苦的协调就在下面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即把欧洲以外世界的土地当作殖民地，也就是说当作掠夺和盘剥的对象。这一历史进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可以把地理发现的时代称为欧洲人掠夺土地的时代。赫拉克利特说过，战争把人聚为一体，法（正义）就是纷争。

十四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为瓜分新世界而互相争斗。战争不仅以军事方式进行，而且为了取得更有利的法律地位，也进行外交的、法律的斡旋。诚然，在这方面，他们对那些土著们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宏大量。他们登上陆地，树起一个十字架，或者把国王的徽章刻在树上，在树根间的空地上放一些鹅卵石或是其他一些证物。西班牙人喜欢以庄重的方式向聚拢起来的一群土著宣称，从今往后，这块土地归卡斯蒂尔王室所有。这种象征性的占有方式据说有足够的法律效力将整个岛屿乃至整个大洲据为己有。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法国、荷兰或英国——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的权利予以尊重。前来掠夺土地的欧洲各个民族之间的争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每一个民族都引证恰好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款，而且当符合自己的目的时，甚至引证与土著们及其酋长们签定的

契约。

只要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不受到外部的挑战，罗马教皇就可以创制法权，维持新世界的秩序，在争夺土地的各种力量中间起一种仲裁作用。早在 1493 年，也就是几乎刚刚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获得了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的一个饬令，在这个饬令中，这位教皇依据其罗马教廷的权威把新发现的西印度地区作为教会的世俗采邑赠送给了卡斯蒂尔王室的莱昂及其继承人。这个饬令确定了一个界线，它从阿左林（Azoren）和伏特角（Kap Verde）西部 100 海里的地方穿过大西洋。西班牙从教皇手里得到了这条界限以西的所有已发现的地方，并将其变为自己的采邑。在随后的一些年里，根据托德西拉斯条约（Vertrag von Tordesillas），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如下方面达成了一致，即位于这条界线以东的所有新发现的土地应该属于葡萄牙所有。这样，瓜分整个新世界的过程就此迅速且大规模地开始了，虽然哥伦布那时才刚刚发现了几个岛屿和海岸。当时虽然人们对地球的面貌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对地球的重新瓜分却大规模、全方位地展开了。教皇于 1493 年确立的那个分界线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于新的基本秩序和地球的新的法的争斗。

在长达 100 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引证罗马教皇的赠礼这一权威，以排挤后起的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领土要求。巴西，1500 年时被卡波拉尔发现，无可争议地属于葡萄牙，因为根据后来向西部移动的那条分界

线，这个美洲西海岸的突出部分正好处于分界线的东半部，也就是说处于葡萄牙的那个半球。然而，其他争夺者并不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条约对自己有约束力，罗马教皇的权威不足以使他们尊重这两个天主教势力对于土地的垄断地位。借助宗教改革，那些新教国家公然摆脱了罗马教皇的任何权威。由此，对于新世界的土地的争夺演变成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西班牙人的普世大公主义与胡格诺分子、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普世新教主义之间的斗争。

十五

有着基督教信仰的掠夺者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阵线以对抗新发现的土著，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有威胁的共同的对手。因此，欧洲基督教民族中天主教集团和新教集团之间的宗教战争和世界争夺就更激烈、其历史影响也更广泛和深刻了。在此名义下，而且从对峙双方的阵营来看，这种争斗看上去的确似乎是一场宗教战争，而且它也确实如此。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有当我们注意到元素之间的对立、以及注意到当时已经开始分裂的自由的海洋世界和坚固的陆地世界的对立时，它的真实的、全面的含义才会显露给我们。

这场宗教战争中的一些人物被一些伟大的诗人搬上了舞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及其异性敌人英国的伊利莎白女

王，成了剧作家们最喜欢的主题。这两个人物都成为席勒的多个悲剧中的角色，而且在同一个剧本中也经常被处理成陷入截然对立的处境之中。这的确是一个优美、富于感染力的舞台场景。但是，那种最深刻的对立，那种固有的敌友处境，以及其中的最终力量及其冲突，却无法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在此期间，德国没有出现过这种值得搬上舞台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对于德国而言如此缺乏行动的时代，即 1550 年至 1618 年间，只有一个德国人成了一个著名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他就是鲁道夫二世皇帝。关于这个人，你可能几乎没有听说过，人们也不敢肯定，他能够存留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然而，他的名字却属于这个时代，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佛兰茨・格利帕策（Franz Grillparzer），有理由使鲁道夫二世成了他的一部悲剧《哈布斯堡的兄弟之争》的核心人物。这部戏剧及其英雄人物的问题和伟大之处在于，鲁道夫二世并非是一个擅长行动的英雄，而是一个阻止者（Aufhalter），一个延迟者（Verzoegerer）。他身上有一种“阻止者”（Katechon）的因素，关于这个词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经提到过。在当时德国所处的情境中，鲁道夫又能做些什么呢？当他认识到，德国以外的那些对抗与德国毫无关系，这已经足够了，当他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往后推迟了几十年，这已经是一个功绩了。

当时，德国处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德国没有参加那场宗教战争，它也不能参与进去。虽然它不能幸免天主教与新教的争执，但是，这种发生在德国内部的争执与那种世界范围

的、牵涉到对于新世界的土地争夺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世界性对抗还不可同日而语。德国固然是路德的故乡以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但是，企图征服世界的几股力量大大超越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这种最初对立，而且也远远超越了德意志的内部问题，达到了耶稣会士与加尔文分子之间的更为深刻、更为明确的对立。如今，它是国际政治里的敌友区分的标准。

路德派的德意志领主和阶层，尤其是帝国的第一个新教领主，即撒克森的选帝侯，仍旧试图保持对天主教皇帝的忠诚。当福音派的德意志各阶层在加尔文教的推动下组成一个军事同盟，而天主教阶层组成了一个对立阵营时，这位撒克森的选帝侯就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了。直到 1612 年，就其是否加入天主教联盟一事仍在进行协商。路德派对于加尔文派的痛恨程度不亚于对教皇派的痛恨程度，也不亚于天主教派对于加尔文派的痛恨程度。一般而言，与远为活跃的加尔文派不同，路德派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更倾向于臣服于某个权威，但这还远不能解释他们之间的敌意。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当时被那些争夺新世界的各种力量排挤在了一边，却从外部卷入了与那些掠夺成性的西欧诸民族的世界性对抗中。与此同时，咄咄逼人的土耳其人在东南部对德国形成了威胁。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耶稣会士和加尔文分子使德国内政面临一种完全陌生的选择。那些信仰天主教但并不属于耶稣会的德国领主和阶层，以及那些信仰路德教而不属于加尔文教的德国领主和阶层，企图避开这一对他们而言完全陌

生的争执。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自身具备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意志力。由于缺乏这些条件，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人们一针见血地称其为“中立偏保守”。其结果是，德国参与了对其完全陌生的海外殖民战争，但却什么也没有捞着。加尔文主义是一种新的战斗性宗教；它成为这种向海洋进发的根本动力的便当工具。它是法国胡格诺分子、荷兰自由斗士以及英国清教徒的信仰。它还是那位伟大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宗教，这位选帝侯是德国领主中凤毛麟角的有着海权和殖民意识的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说，地处瑞士、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内陆国家的加尔文团体是无足轻重的，如果他们不参与到这种海上活动中来的话。

所有的非加尔文分子都对加尔文宗教充满惊惧，尤其是那种关于人的永恒预定的观念。依照世俗的观点，预定论只不过意味着把人的意识从这个被诅咒的沉沦的、腐朽的世界极大地提升到另外一个世界。用现代的社会学术语来表达，它乃是一种精英的自我意识的极致，他们对其地位和历史时刻充满信心。简单地说，他确信自己能够被拯救，而这种拯救又是所有世界历史的根本意义。正是以这种自信，荷兰的村夫们欢快地唱道：陆地变沧海，自由忽闪现。

当海洋这一根本能量在 16 世纪突然爆发后，其成果是如此深巨，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它就席卷了世界政治历史的舞台。与此同时，它也势必波及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语言。它已不再在捕鲸人、航海家和海上漫游者的阶段留恋徜徉。它必须寻找自己的精神盟友，即最勇敢、最极端的盟

友，这种盟友彻底地终结了先前时代的种种浪漫图景。这个盟友不可能是当时德国的路德派，因为他们宁愿倾向于一种领土原则和普遍的大陆化。不管怎么，一个相当清楚的事实是，在德国，汉莎同盟的终结与路德教的产生是同步的，正如荷兰海权意识的觉醒以及克伦威尔的重大决断与加尔文时代恰好同步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的还很少。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历史研究仍然受制于陆地的视角。他们的视野中永远是坚固的陆地及其政治的发展，对于德国来说，甚至只有领土性国家的演进，从而常常陷于一种小国寡民的狭隘眼界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海洋，我们会立刻发现那种巧合或者——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述的话——世界历史的兄弟情谊，这使得政治化的加尔文主义与海洋能量在欧洲的爆发联系在了一起。即便是这个时代的宗教战场和神学战斗口号，在其根底上也充斥着各种基本力量的冲突，它们使得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从陆地转向了海洋。

十六

当土地的瓜分以最大的规模在陆地方面进行之时，另外一半同样重要的、对于我们的星球的重新瓜分已经在海上完成。它是借助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而实现的。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整个欧洲在海洋方面努力经营的结果。由此，第一个星球空间秩序的基本轮廓得以确定，其本质建立在陆地与海洋的区分之上。这样，坚固的陆地从属于一群主权国家，而海洋则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说属于所有的国家，还可以说，实际上最终只属于一个国家：英国。坚固的陆地的秩序在于，它被分割为不同的国家领土；而公海则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不受国家的控制，不服从于任何国家主权。这就是空间上的基本事实，历经 300 年的发展，从中诞生了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此所谓那个时代的基本法则，即大地法。

只有在英国称霸海洋以及陆地与海洋的分野这个基本事实的背景下，许多著名的、且经常被引证的句子和流行说法才能获得其真实的含义。比如，瓦尔特·拉莱爵士说道：“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的贸易，谁主宰了世界的贸易，谁就拥有了世界所有的财富，事实上也就拥有了世界本身。”或者说：“所有的贸易都是世界贸易；所有的世界贸易都是海上贸易。”正值英国海权和世界霸权达到顶峰之际，还有这么一个关于自由的警句：“所有的世界贸易都是自由贸易。”所有这一切说法都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的，但它们是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国际局势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试图在其中寻找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时，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然而，首先是在陆战和海战的对立中，陆地与海洋的区分才显露出来。无论是从战略上说，还是从战术上讲，陆战和海战都永远是两个不相同的事情。然而，如今它们之间的冲突乃是不同的世界以及彼此对立的法律信念的表达。

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形成了关于陆战的方式的一些想法，它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即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情。对阵双方乃是由国家组织的、军事性的权

力，而军队则在公开的战场互相接战。只有参与战斗的人员才作为敌人彼此对垒，而不参加战斗的平民置身于这种敌对行动之外。他不是敌人，对手也不把他以敌相待，只要他不参与战争。而海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敌人的贸易和经济应该成为攻击的目标。在这种战争中，敌人就不仅仅是参与战斗的对手，而且也包括敌国的所有成员，最终也包括那些中立的、与敌国有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的国家。陆战意味着在陆地上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公开战斗。而海战自然地是在海上的决战，然而，其典型战法乃是炮击和封锁敌人的海岸线，根据战利品法夺取敌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因此，海战的实质在于，其攻击的目标不仅是军事目标，也包括非军事目标。比如，尤其是那种粮食封锁，它将影响到所有受困地区的居民，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幼童，无一例外。

这不仅是国际法秩序的两个方面，而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自从英国控制了海洋以后，英国人以及受其观念影响的民族已经习惯了这一点。根据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陆地国家能够控制整个世界，是闻所未闻、无法接受的。对于一个建立在与陆地相分离的海洋性存在这一基础之上并囊括了世界各大洋的世界霸权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欧洲西北部边缘的一个小岛竟然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的中心，靠的正是与大陆脱钩，并选择海洋。在这种纯粹的海洋性存在中，这个岛国找到了建立一个波及全球的世界霸权的手段。自从陆地（土元素）与海洋

（水元素）的相互分离成为这个行星的基本法则之后，大量的理论、论证以及科学体系开始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借此人们试图解释这种状态的明智以及合理性，而无视那个最源初的事实：英国的海上霸权及其时代性。国民经济学的伟大学者们、法学家们以及哲学家们发明出了这些体系，而我们的大多数先辈们竟然对此笃信不疑。最后，他们连另外一种经济学和国际法的可能性也不指望了。由此，你可以看到，那个利维坦也同样支配着人的精神和心灵。这是最令人惊异的控制。

十七

英国是一个海岛。然而，只有当它成为从陆地转向海洋这一根本变革的承担者和中枢时，并且只有当它成为当时所有释放出来的海洋能量的继承人时，它才把自己真正变成了人们所称的海岛，如果人们一再强调，英国是一个海岛的话。而且，只有当它在一种崭新的、迄今为止尚未人知的意义上变成了一个海岛，它才实现了英国对于世界诸大洋的控制，并取得了当时行星空间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

毋庸置疑，英国是一个海岛。然而，光是这种地理事实上的论断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世上有很多海岛，其政治命运却各不相同。西西里也是个海岛，爱尔兰、古巴、马达加斯加以及日本同样都是海岛。然而，它们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其海岛的身份是多么不一致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

的陆地包括最大的洲都只不过是个海岛罢了，正如希腊人已经知道的那样，所有被人居住的陆地都被海洋环抱着。自从许多世纪以前——可能是公元前18000左右——与大陆分离以后，英国本身在地理意义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海岛的本色，尽管遭遇过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的冲击。尽管有过以下经历，它仍然是一个海岛：凯尔特人的殖民，恺撒的征服，1066年被诺曼人征服，以及在奥尔良贞女时代，英国人曾占领了大部分法国领土。

这个海岛的居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堡垒之中。中世纪流传给我们许多美丽的诗文，其中，英国是以一个被海洋拥抱的城堡的形象而被传扬的。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表达那种孤岛意识的最著名、最美丽的诗行：

又一座伊甸园，
海岛中的皇冠，
恍若天上的乐园，
它像浑然天成的堡垒，
又似镶嵌在银色海洋中的金钻，
海洋像一堵城墙围裹着它，
犹如一道看护屋宇的天堑。

不难理解的是，英国人为什么时常吟诵这首诗，尤其是，“镶嵌在银色海洋中的金钻”这句话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然而，英国人的这种孤岛意识却是属于早先那个海岛。当时这个海岛还被理解为是一块被海洋环绕、与大陆分离的陆地。这种孤岛意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陆地性的。更有甚者，这种孤岛意识显露了其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和陆地意识。把每个岛民以及今天的所有英国人都看作是天生的海上漫游者，这将会是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使得在16世纪时还是个牧羊的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海的儿女。它是海岛本身的政治—历史本质的根本变革。也就是说，如今是从海洋的视角看陆地，而且，从前作为孤悬海外的大陆的一部分的海岛，现在变成了海洋的一个部分，成为一条船，或者更明确地说，成为了一条鱼。

从海洋视角所作的对于陆地的合乎逻辑的观察，对于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观察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的日常用语充满了陆地的烙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文章的开始就提到过了。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行星叫做地球，而忘记了我们还可以把它叫做海球。当话题涉及海洋时，我们经常谈到航上通道，虽然海洋上只能有航线，而没有像陆地上的通道那样的道路。我们把海上的船看作行驶在海洋里的一块陆地，看作一块“游动着的国土”，正如人们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法论文中所说的。一艘战船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游动着的堡垒，而像英国那样的海岛则像一个被海洋护卫着的城堡。对于以海洋为生的人们而言，上述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不知海洋为何物的老土们的一厢情愿的编排罢了。一艘船并不是一块游动的陆地，正如一条鱼

也不是一条游动着的狗一样。相反地，从海洋的视角观察，坚固的陆地只不过是一个海岸，一个拥有腹地的海滩。从海洋以及海洋性存在的视角出发，甚至整个大陆只不过是海洋的搁浅物和排泄物。一个让我们十分惊异、然而从海洋的视角来看又很典型的观察方式的例子是伯克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西班牙只不过是一条搁浅在欧洲海岸的鲸鱼。

当英国向一个纯粹的海洋性国家过渡时，它与其他世界的所有实质性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大陆诸国的关系也必须相应地发生改变。如今，英国政治的所有标准和尺度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无法比较和协调。英国成为了海洋的女主人，并且基于其全球的海上霸权，建立了一个波及全球各个部分的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英语世界开始用基地和交通线这样的方式考虑问题。其他民族视作土地和家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后方罢了。“大陆的”这个词甚至还有一个衍生含义，即“落后的、守旧的”，而居住在大陆上的居民则是“守旧的民族”。然而，大不列颠岛本身，这个以纯粹的海洋性存在为发展方向的世界性帝国的中枢，由此而成为无根的海洋性存在。像一艘船或一条鱼一样，它可以向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游动，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帝国的可以移动的中心，这个帝国辐射到了所有的大洲。迪斯累利，这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关于印度问题曾经说道，大英帝国与其说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如说更是一个亚洲国家。也正是这个迪斯累利，1876 年时，在英国女王的头衔上增加了印度女王的头衔。这清楚地表明，英国的世界霸

权是借助印度而获得其帝国的性格的。这同一个迪斯累利在其 1847 年的小说《唐克雷德》（*Tancred*）中已经建议，英国女王应该向印度迁都。“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全部王室成员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那里，她将发现一个庞大的帝国等待着她，拥有第一流的军队和充足的储备。”

迪斯累利是 19 世纪的阿伯拉维尔（Abravanel）。他说过的一些话，比如，种族是世界历史的密码以及其他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话，被非犹太教徒和非基督徒们狂热地传播着。因此，当他提出上面所说的建议时，他很清楚他在说什么。他预感到，英国这个岛屿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启程，改变其作为一个海洋性世界帝国的首都的位置。这艘船可以在这里起锚并在另一个地方抛锚。这条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可以游动起来，找寻其他的海洋了。

十八

英国的全面的、无可争议的海权时代开始于滑铁卢战争之后，当时经过了 20 年的战争，拿破仑最终被击败。这个时代贯穿了 19 世纪。这个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以及 1856 年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巴黎和会上，英国的海权处于鼎盛时期。自由贸易的时代同时也是英国的工业和经济的优势自由拓展的时代。自由的海洋与自由的国际市场在自由

这个观念中汇合了，其承担者和保护者非英国莫属。这个时期，对英国模式的崇拜和模仿也达到了顶峰。

一种内在的变化触及了利维坦的本质。当时还没有人发现这一点。恰恰相反。由于当时世界经济的惊人增长，这个实证主义的、被迅速积累的财富冲昏了头脑的时代相信，财富将会持续增长下去，最终实现一个千年的人间天堂。那个触及利维坦本质的变化正是工业革命的结果。随着机器的发明，工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的英国。第一台炼焦炉（1735 年），第一块件铸钢（1740 年），蒸汽机（1768 年），纺纱机（1770 年），机械织布机（1786 年），所有这一切都最先出现在英国，单单这些事例就清楚地说明，与其他民族相比，英国工业的优势地位是多么明显。蒸汽机和铁路在 19 世纪问世。在这方面英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巨大的海权同时成为巨大的机械力量。此时，英国的世界霸权似乎已成定局。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从莱畔托海战（1571 年）到西班牙无敌舰队毁灭于英吉利海峡（1588 年）的短短几年里，海洋性存在的进展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同样巨大的进展发生在 1854 年到 1856 年由英国、法国和撒丁发动的反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与 1861 年到 1863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之间这个时期，其中北部的工业国家战胜了南部的农业国家。克里米亚战争仍然使用有帆的战船，而南北战争已经开始使用装甲汽船。由此开始了现代的工业和经济战争的时代。在这方面英国还是领先一步，一直到 19 世纪末仍然保持着巨大的优势地位。但是，这个发展同时也意味着陆地与海洋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此时利维坦由一条巨大的鲸鱼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事实上，这是某种异乎寻常的质的改变。机器改变了人与海洋的关系。那类曾经在海洋上创造过辉煌的大胆的人丧失了其原来的重要性。那些勇敢的海员在帆船上所取得的成就，高超的航海技术，对于某种类型的海员的严格培养和筛选，所有的这一切在现代化的、机械化的航海工具面前都相形失色了。海洋永远保留着塑造人类的权力。然而，那种强大而持续的动力——这种力量把一个牧羊的民族变成了海盗——却减弱了，最后慢慢消失了。机械装备嵌入海元素和人的存在这一关系之中。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建立在机械工业这个基础之上的海上霸权与另外一种海上权力是两码事，这种海上权力是日复一日地与海洋这种元素进行最艰苦的直接搏斗赢得的。一艘由人的肌肉驾御的帆船，与一艘由气轮发动的船，代表着与海洋这个元素之间所存在的两种不同关系。工业革命把那些从海洋这一元素中诞生的海的儿女变成了机器制造者和机器的奴仆。

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变化。有的人为那种古老的、富于英雄色彩的时代的消失而哀叹，并流连往返于海盗传奇故事的浪漫情怀中。另外一些人则为技术的进步而欢呼，并沉溺于虚构出来的人间天堂的乌托邦想象中。客观地说，纯粹的海洋性存在这一造就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秘密，遭受了致命打击。但 19 世纪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鱼也好，还是机器也罢，那个利维坦都将变得越来越

强有力，它的帝国看上去似乎没有止境。

十九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美国海军上将马汉做过一个令人难忘的尝试，他也把英国称霸海洋的最初局面追溯到那个机器时代。马汉就是撰写那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这是他的代表作，已经被翻译成德语，并获得德国海军舰队、尤其是其缔造者海军上将忒皮茨（Tirpitz）的高度赏识。

在 1904 年的一篇文章中，马汉探讨了英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重新联合的可能性。他不认为共同的种族、语言或文化能够成为这种重新联合的最深层的基础。当然，他也从不贬低其他人经常提出的此类观点。但在他看来，这些因素只不过是令人高兴的附加物罢了。对他而言，具有决定性的理由乃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海洋的控制必须保持下去，而这只能在“岛国的”基础上通过两者的联合才能作到。在不断进步的现代世界，英国本身已经显得太过狭小，因此，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海岛了。美国才是符合时代发展的真正的海岛。马汉认为，由于美国幅员广阔，它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它却与现今的标准和尺度相适合。美国的岛国特点使得它对海洋的控制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基础上予以保持和发展。美国是一个更大的海岛，借助它，英国对于海洋的控制才可能稳固，并且盎格鲁—美利坚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海上霸权才能够以更宏阔的方式延续下去。

当迪斯累利那样的政治家建议大英帝国迁都亚洲时，美国的这位海军上将却在考虑将它迁往美国。这种思维方式对于 19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海军人士而言是相当正常的。这位海军上将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看到了工业发展必然带来的各种尺度和标准的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工业巨变所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人与海洋的基本关系。因此，他仍然局限于旧有的思考方式中。他的关于更大的岛屿这一设想显示出，在一个全然一新的局面下，他仍然保留着那种已经过时的、古老的传统。原来的那个过于狭小的岛屿及其一整套海权和世界霸权的体制将附着于这个新的岛屿，而这个新的岛屿则又像一艘巨大的拖网渔船，把建立在那个小岛基础之上的那一整套海权和世界霸权体制拖上了岸。尽管马汉的人格极富魅力，而且他的关于更大的岛屿的构想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构想并没有切中一个崭新的空间秩序的要害。这一构想并非来自早先航海家的精神。它出于一种保守的地缘政治的安全需要，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那种根本动力，16、17 世纪时，正是这种动力促成了航海家的冒险精神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信仰的历史性结盟。

二十

工业发展和新科技并没有在 19 世纪的水平上止步不前。它们不仅仅停留在轮船和铁路的阶段上。世界改变了自身并

步入了电子技术和电动力学的时代，这甚至比那些对机器盲目崇拜的先知们预想的还要快。电力、飞机和收音机使得空间的观念产生了如此大的颠转，以至于开启了第一次行星空间革命的新阶段，如果不是开启了第二次空间革命的话。

从 1890 年到 1914 年的几年里，欧洲大陆的一个国家，德国，开始与英国并驾齐驱，甚至在几个重要的领域超过了英国，如机器、船舶和火车制造业等。其实早在 1868 年，德国的克鲁伯公司在火炮制造业上就能与英国人相抗衡了。1914 年的世界大战正是处于这种新的转折过程中。当然啦，各个民族及其政府昏头昏脑地投入了战争，好像它是一场司空见惯的 19 世纪时的战争，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迎来了一个新的空间革命的时代。在当时高度工业化的德国，英国的宪政理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英国的观念被当作古典观念。而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家，沙皇俄国，于 1914 年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在其广袤的土地上却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自己的现代发动机。事实上，从汽船到现代战舰的进步并不比从橹舰到帆船的进步更小。人与海洋这个元素的关系重新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被改变了。

当飞机参与近来时，甚至一个崭新的、在陆地和海洋之外的第三个维度被征服了。这时，人超出了陆地和海洋的表面，由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以及一种同样全新的武器。各种标准和尺度在继续变化，而人对于自然和他人的控制范围在无限制地增加。难怪空中武器干脆被称为“空间武器”，因为空间革命的效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强烈、直

接和明显。

此外，人们还知道，不仅飞机能够穿越大气层，高高越过陆地与海洋，而且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射台发出的无线电波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围绕地球周围的大气层运转一周，因此不难使人相信，如今，人们不仅征服了崭新的第三维空间，而且甚至也征服了第三种元素，即作为人类生存的新的基本空间的空气。这样，在那两种神话般的动物即利维坦和波希墨特之外，又增加了第三种更大的鸟。然而，我们不应该仓促地得出这些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想一想，人类在大气层里的权力是以什么技术—机械手段和能量才得以施展的，人们就会想到火药式内燃机，借助它飞行器才能被发动，因此，火才是那种新加入的支配人类行动的真正的新元素。

目前，我们还是把除了陆地与海洋之外新增加的两种元素暂时抛开。现在，无论是认真的权衡还是奇思妙想仍然显得过于杂乱，这为想象和思考提供了无穷的回旋余地。根据某种古代学说，整个人类历史乃是穿行于四元素之间的一次旅行。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对待我们的题目，两个客观的、可靠的结论对我们而言就变得可能了。第一个结论与空间观念的变革有关，而空间观念的变革又伴随着空间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应运而生。这种空间观念变革的深度与我们已经熟知的 16、17 世纪时相比，不逊分毫。当时人们在虚无的空间里发现了这个世界。如今我们不再把空间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清除了任何能够被思考的内容的立体维度。空间对我

们来说变成了能量、行动和建功立业的力场。对我们而言，直至今日这样一种思想对我们而言才变得可能，而它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一位德国现代哲学家是这样表达它的：世界不在空间中，而是空间在世界中。

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涉及陆地与海洋的根本关系。如今海洋已经不是捕鲸人和海盗时代的那种元素了。当今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已从中创造出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空间。如今，在和平时期，任何一个船主在任何时刻都能够知道，他的船体位于海洋的哪个位置。由此，与帆船时代相比，海洋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真是这么回事，那么海洋和陆地的区分——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迄今为止的结盟正是建立在这个区分之上——就变得多余了。它既然取消了英国海上霸权的这个基础，也就随之取消了迄今的大地法。

取代这种大地法，一种新的法在我们这个行星上源源不断、不可阻挡地生长起来。人与新旧元素的新关系呼唤着这种新法的诞生，已经变化了的人的存在标准和尺度也逼迫着它的诞生。很多人从中只瞥见了死亡和毁灭。有些人相信自己正在经历世界的毁灭。实际上，我们所经受的只是迄今为止的陆地与海洋的关系的终结。然而，人对新事物的恐惧常常与对虚无的恐惧同样强烈，尽管新事物是对虚无的克服。因此，那些人只看到毫无意义的混乱，孰不知一种新的意义正在为着某种秩序而斗争着。当然，旧法已经瓦解了，与其相关的一整套传承下来的标准、规范和关系也随着消失了。但是，将要诞生的却不仅仅是混乱和虚无。即使在新旧力量

的激烈较量中也能产生公正的尺度，并各得其所。

> 这里仍由诸神主宰，
> 他们的法力无边。

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

——现代国际法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

在这篇研究中，我将把欧洲历史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置于一个正确的方向予以阐释，这个转折点就是国家时代的开端，在长达400年的历史中它规定了现代世界的尺度和方向。这个时代一直从16世纪延伸至20世纪，国家乃是统治一切的政治统一体的秩序性概念。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对国家的发展和形成作出了贡献，许多先驱者、过渡阶段和发展进程，尽管数不胜数，但还是能把它们辨示出来。然而，那种借助人的行动和决断而实现的转折却使人能够更为清晰地分辨出来。我准备把这一决定性的开端放在16世纪的后半叶。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说，那是一个相当悲惨、鲜有作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影响及其转折性特质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史越来越有意义。16世纪时，一场围绕着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运而生。它形成了两个庞大的阵营，即世界天主教阵营和世界新教阵营。

以法国、荷兰和英国为首的新教一方对于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首的天主教世界霸权及其对海洋的垄断权发起了第一轮富有成效的攻击。正是在这种教派性的内战中，在法国诞生了一种关于最高政治决断权的思想，它使所有的神学—教会的冲突中立化，使生命世俗化，就连教会也变成国家的教会。

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在法国首次获得了权威的法律形式。由此，“主权国家”这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开始进入欧洲民族的意识之中。对于以后几个世纪的想象方式而言，国家完全成为了唯一正常的政治单元的表现形式。

这样一来，古老的德意志帝国及其封建的、等级制的以及教会的各种宪法要素的混杂秩序（Gemengelage 字面意思是：“属于一个农业机构的分散的农田。”——译者）被排挤到了中世纪；因为它是一个帝国，而不是国家，这就使它“变得不可理喻了”。国际法转变为一种国家之间的法律；武装冲突从武力自卫或私人争斗变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家”这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成了欧洲的统治一切的秩序观念，可以从以下发展趋势最终表现出来，即，19 世纪时，国家已经成为适用于任何时代和民族的普遍概念，尤其成为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秩序的观念。今天人们听到的乃是，人们已经不再谈论什么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而是谈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所谓的“古代国家”，不再谈论帝国，而是谈论所谓的“中世纪的德意志国家”，甚至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中国人的所谓国家。那种纯粹与时代相联系的、由历史限定的、具体的政治单元的组织形式，在此情形下就丧失了其历史位置及其典型内容；在这种具有迷惑性的抽象性中，这种国家形式被移植到各个背景全然迥异的时代和民族，投射到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产物和组织中。这种将国家概念提升为所有时代和民族的政治组织的普遍的规范性概念，似乎与国家时代本身一起很快要走到头了。然而，既然它现在还存在于世，我们在此还是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与 16 至 20 世纪欧洲历史相联系的政治秩序观念、亦即国家这个概念的具体的历史特质指出来。

最先在所谓的“国家”和“主权”中找到摆脱宗教战争以及内部政治困境的办法的国家乃是法国。众所周知，让·博丹（Jean Bodin），一位纯粹的法国法学家，他的国家的法学传统的代言人，第一个界定了国家主权的含义。他在 1577 年出版的那本书就叫做《共和国六论》，拉丁文版本称为《论共和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的标题中还没有使用“国家”这个概念。然而，面对那些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封建的—等级制的法律观念的混乱状况，在一个政治单元范围中，主权者和国家的决断的必要性就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对于国家所进行的法律的—决断意义上的理解对其他欧洲国家就施加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法学家博丹那本充满学识、材料丰富的著作乃是这个转折时代的重要成果。这本书的作者在许多领域均声誉卓著，他不仅是法学家，而且还是

他那个时代的“politicen”[①]，在经济领域中，他又是所谓的数量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历史学领域，则有许多颇具原创性的观察，最后，由于他的 *Heptaplomeres*[②]，他也是一位现代宽容思想的无比勇敢的开拓者。1577 年出版的那本书本身已经无法与其他一些更有影响的法学或历史学著作相提并论了。他的博学多识的详细论述的确被人遗忘了；但是，他的主权观念的即时影响以及持续影响在整个欧洲都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对冲突事件拥有决断权的主权的观念在欧洲各地、尤其是在德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还需要等到几乎是 100 年后在普芬道夫那篇著名的论文“论德意志帝国现状”（*De statu Imperii Germanci*）才以持续的效力表现出来。在博丹的主权概念中，法学上的概念创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应和。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这一法学概念在一种新的秩序观念的尺度下大获全胜。由此，它与一种法学意义上的概念创制有关，这一点与法兰西民族自身内政的发展和精神特征相吻合。法国国王们，在其法学家们的建议和推动下，创立了最早的现代国家，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权者，就长远来说，他们使法国成为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完美的主权权力的原型和典型个案。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法国确立了这种新秩序观念的内在尺度及其方方面面。毋庸置疑，

① 亦即“Politiques”，博丹时代以政治的功用为标准对待宗教的政治家、思想家。——译注
② 博丹最后一部对话体巨著《有关崇高事物之秘密的七哲人谈话录》（*Colloquium heptaplomeres de rerum sublimium arcanis abditis*）。——译注

“国家”这个概念已经经由马基雅维利添加进了欧洲各个民族的政治词汇表中。而且，国家这个概念的诸多含义与诸多空间想象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德语构词法中更是如此，如“城市”（Stadt）以及“地点”（Staette）所暗示的那样。但是，封建的一等级制的法律观念被一种整齐划一的、最高的主权者的决断以及那种崭新的欧洲的标准—秩序概念“国家”所取代却是从属于这样一种政治处境，这种政治处境在法国法学家博丹的主权学说中找到了其存在论上的相应表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僭主们的弹丸之地，无论是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的城市，还是凯撒·博吉亚的城市，都不能贯彻和实施一种新的欧洲的尺度—秩序的观念。作为由法国贯彻实施的主权概念的结果，其后的 17、18 世纪时那些德意志的狭小的国中之国只能沦为欧洲均衡政治的单纯的砝码。

对于深受内战分裂之苦的法国，主权概念在博丹本人那里已经不仅仅具有内政的含义。虽然整个欧洲的这种全新的秩序观念的功效直到 17、18 世纪才得以完整地表现出来，博丹仍然在一个在学术上颇为遗憾地很少被人关注、但却具有高度的启发性的章节中已把欧洲的外交形势置于其主权概念这一视角之下了。他把审视的目光投向整个欧洲，试图借助刚刚发现的“主权”和“国家”的秩序概念为欧洲的封建的邦国林立的混乱状态建立秩序。而且，他已经能够列举几个他认为是主权国家的欧洲国家了：除了法国，还有英国，苏格兰，丹麦，瑞士各州，莫斯科的克涅茨帝国（Knez），

以及波兰等。在他看来，意大利的土地上只有一个主权国家，即威尼斯。在德意志，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抑或是帝国首都都不是主权者。因此，比刚才提到的普芬道夫那本著作几乎提前100年，以下情势就显露无疑了：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注定要成为“主权概念”这一全新的秩序观念的爆炸性力量的牺牲品。

随着“国家”这种新的秩序概念粉墨登场，封建的、等级制的中世纪混杂秩序开始慢慢地被清除一空。国家确立了一种在地域上完整的政治统一体。国家拥有最高主权这种法学思想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这使得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形成了空间上自成一体、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数学般精确的疆界、以及中央集权的和普遍理性化了的统一体即“国家”。众所周知，统一的国家权力的特殊组织手段乃是国家军队，国家财政以及国家警察。法律日益转变为一种国家的、由国家的司法机构操纵的法律，并且在国家的成文法典中找到了其适当的体现方式。中世纪的社团和组织，封建的、等级制的或者教会的团契丧失了意义。尤其是，教会或者成为一种保持公共安宁、安全和秩序的手段，由此乃是国家警察和民众教育的一种手段，或者成为一种虔诚个体的纯粹私人性的关怀。就教会所提出的权力要求来看，外在规定的国家教会的崇拜仪式与内在的信仰越来越明确地分离开来。在这种新的由主权国家统驭一切的处境下，即便是反新教改革的罗马教会也知道，为了实现其诸多诉求，有必要提出一种“间接权力”的说法，正如反对新教改革的神学家贝拉闵所认为的

那样，这个说法乃是意义模糊的、为各种歧路大开方便之门的通道。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国家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即使是德意志民族，在其成为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并在欧洲为德国赢得主导权之前，也得通过主权国家这道狭窄的关隘。

向国家的最高主权过渡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总体现象。这个趋势可以从许多方面予以观察，也可以划分为很多阶段性日期。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即16世纪的后半叶，它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这个过程才最终完成。尤其是，这种向领土性的、国与国之间以明确的疆界予以划分的完整的主权国家的过渡，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告彻底完成。以前，尤其是16、17世纪时，这种新颖的、特别是国家间的疆界的观念还十分模糊，法国与德意志帝国、或者英国与苏格兰之间的边界还不仅仅被看作是“疆界”，它被视为交战区域，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分界线。尽管这样，伴随着主权概念的出现，至关重要的是：主权国家不仅是一种消灭了中世纪的帝国和社团秩序的全新的观念，它首先也是崭新的空间秩序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随便一种新颖的、取代了从前的秩序观念的秩序。确切地说，具有实质重要性的乃是，它将这种新的空间秩序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历史瞬间，在这个历史时刻，一种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关于行星的空间革命向世人显示了其最初的具有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意义的影响。由环游地球以及发现地球的新的部分而导致的地球和世界图景的变化，开始改变着所有的既有关系。那个时代的所有精神思潮都为这一空间革

命作出了贡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文主义，以及巴罗克。数学、力学、物理学方面的种种伟大的发现以及天文学、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图景的变化直到 17 世纪才开始得以实现。但是，欧洲人 16 世纪时就致力于从以下变局中引申出了种种政治结论，即一个新世界敞开在世人面前，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必须重新予以奠基。这场空间革命的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如乔达诺·布鲁诺和伽利略等，当时却遭受了政治上的迫害，成为审查机关和宗教裁判所的牺牲品，而就在几十年前，哥白尼及其科学发现还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然而，与乔达诺·布鲁诺有所不同，对于哥白尼而言，世界仍然是有限度的，根本不是无限的。然而，如今随着新的行星的地球图景的形成，那种无限的、也不可限制的大千世界的空间向人们敞开了。

16 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 19、20 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这促使索邦的经济史教授亨利·豪塞甚至把 16 世纪称为 20 世纪的原型，虽然从其他角度观察，16 世纪还深深地滞留于中世纪时代。法国最先在概念上为某种内在形式找到了一种明确的开端，这种内在形式使法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国就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它的官方习惯用语乃是人的意识领域中的法律观念；它的语言乃是欧洲民族的外交往来和国际法交往的语言。关于自然疆界的学说极为成功地成为欧洲的秩序规则。由此，法国也为新的空间秩序观念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概念标准。与意大利城市僭主们的城邦的惊人狭小相比，法国所提供的关于主权国家的尺度却要宏阔、甚至是辉煌得多。但是，按照这个世纪里向人们敞开的新的行星的世界图景的无限广度来衡量，它仍然显得微不足道和过于狭小。

因此，从空间秩序的视角来看，主权国家的概念乃是一个陆地性的观念。它是一个大陆性国家的概念。它只不过是那个世纪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发生的剧烈空间革命的许多后果中的一个。尤其是，它没有抓住另外一个远为广阔的方面，它没有碰到和涉及海洋。从海洋这个方面出发，那种国家的、封闭的、有疆界的空间观念的对立面才显现出来。那种自由的、也就是说摆脱了某种国家空间秩序的束缚、国家疆界无法穿越的海洋，成为了权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空间观念。这种朝向海洋性自由的进展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获得一种确定性并成为一种明确的习惯，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在其当今的意义上，直到 18 世纪时，它才变得无可争议。至于更为精确的关于海疆——海疆以外乃是自由的海洋——的确立，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发展。事实上，直到普芬道夫——他开始有了科学的意识——那个年代，欧洲法学的思考范围仍没有脱出地中海的范围，与刚刚发现的世界诸大洋无关，而且他们对海洋问题的思考所借助的理智手段乃是罗马法的习惯。直到滨克舍克（Bynkershoek，1703 年），此前偶尔有效的观念才获得胜利，即滨海国家的国家主权可以向海中延伸到武器的射程所及那么远。直到 1782 年迦利阿尼

(Galiani）的一本书出版后，著名的三海里海疆说才确立下来。

当法国、荷兰和英国开始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的垄断性诉求时，对于世界诸大洋的争夺已经激烈地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段即16世纪中叶展开了。由此开始了一个在陆地与海洋之间截然对立、在封闭与开放两极分化的空间秩序观念的发展过程。坚实的陆地成为国家的领域，而海洋则保持自由，也就是说独立于国家，不是国家的领土。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这构成了欧洲国际法的惊人的两元格局。“国际法”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毫无差别的说法是错误的，误入歧途的，因为，实际上，两种彼此毫无关系的国际法同时并存且发挥着效力。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诞生了，但又迅速瓦解为陆地和海洋两种秩序。在地域封闭的主权国家的领土内，陆地被予以分割，而海洋则独立于国家。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中，海洋意味着什么？既然国家才是统御一切的秩序概念。海洋不知道疆界为何物，而且将是唯一的、无须考虑地理情势和邻里关系的统一的空间，这种空间对于和平的商贸抑或是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应该保持一视同仁的自由和开放。

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观念即陆地与海洋势必与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法秩序相吻合，一种是海洋的国际法，另外一种是陆地的国际法。每一种国际法都有自己独特的、与另外一种国际法截然不同的战争与敌对的概念。在陆地上，国家乃是国际法的唯一规范的主体，因此，也是秩序、进步以及人

性化的唯一的承担者。尤其是，陆地战争通过以下手段得以合法化，即，使这种战争变成国家的战争，也就是说成为发动战争的国家军队之间的武装对抗。对于陆地战争来说，所有的理性化——即缩小与避免战争的总体性——在于使它成为国家战争，即在日益尖锐化的对抗中成为一种国家间的、由国家组织的军队领导的、不伤害平民和私人财产的、纯粹是国家的战争。相比之下，海洋性国际法秩序中的海战并非仅仅是军事人员的战争，而是建立在一种整体的敌对概念这一基础之上，它不仅把任何一个敌对国民当作敌人看待，而且也把与敌人通商、加强敌人的经济实力的人看作敌人：对于这种战争而言，以下原则是不容置疑地予以坚持的，即敌人的私人财产乃是海上战利品权的对象，依据国际法上认可的、尤其是海战法上的封锁规定而言，被封锁地区的所有平民都不加区分地包括在内，依据其他国际法上认可的、尤其是海战法上关于战利品法的规定，甚至中立的私人财产也被计算在内。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与敌对概念并非基于一个共同的概念。战争概念的这种差异性也使两种战争之间的和平本身有着不同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在这里强调以下一点时，决非赘言，即，在通常所适用的国际法习惯和术语背后，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法秩序，两种不可调和的、相互对立的法律观念的世界。

然而，两种国际法秩序的对立只是两种不同的整体立场的对立的表达，而这又与不同的历史图景、不同的发展观念、不同的人性概念和人性理想相吻合。这种对立不仅仅是

两种不同的道德立场的对立，如那种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那种以法制国的面纱予以遮掩的世界霸权的要求之间的对立，如艾拉·克劳（Eyre Crow）先生在其经常被引述的写于1907年的备忘录所经典地表达的那种对立，如格哈特·里特（Gerhard Ritter）最近向我们描述的那种马基雅维利与莫尔之间的对立、国家的思维与海岛的思维的对立。事实上，这是两种毫无瓜葛的世界的对立。

我认为这并非仅仅是那种古老的陆地政权对抗海洋政权、或者海洋政权对抗陆地政权的一个个案。它乃是人类历史最古老的内容，其中海洋政权与陆地政权的对立被看作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即所谓的海洋对抗陆地。人们一般把它比作鲸鱼与北极熊的争斗，还把它神秘地描述为利维坦与波希墨特的争斗。毫不奇怪，在历史上的诸多战争中存在着很多这样的事例，如雅典和斯巴达，迦太基和罗马，以及英国与诸如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等等。这种类比对于积累历史知识是有价值的，但它们并没有解释清楚那种实质性的东西。兰克在他的法国史中说过，如果不研究法国与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冲突，就几乎无法理解16、17世纪时的法国，就像不研究斯巴达，就无法搞清楚雅典一样。但是，这只涉及整体发展过程的过渡阶段，这个整体发展过程在陆地与海洋的冲突中找到了其关键所在。尽管西班牙拥有海外占有物，但还不能称为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法国则通过发现和贯彻一种主权国家的空间秩序观念，选择了陆地。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历史决断在对海洋世

界与陆地世界之间的决断中达到了高潮，在世界史中，这种对立及其深度绝无仅有。因为，这种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不再表现为单单为某一个如地中海那样的海盆而争斗，相反，它发生在一种处于星体间的陆地与世界诸大洋的宏阔视野中。一般来说。这种变革的深度只能在星体的世界图景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也就是说16世纪以后才能发生。与所有那些进入过我们的视野的先例——如雅典与斯巴达或迦太基与罗马——不同，这种冲突发生在16、17世纪时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星体空间革命的视野中。

不是法国、也不是荷兰——这两个国家在与西班牙进行斗争的第一个世纪中似乎处于领先地位——在伟大的星体决断中选择了海洋，而是英国。欧洲所有民族的勇敢的航海行动促成了英国的成功。源自13世纪时的一个英国预言成为现实：“狮子的儿女将变为海中的鱼。”为了认识这场变革的固有内容及其全面的历史影响，有必要首先考虑那些活跃地冲在前面的团体。谁是那些促成对于海洋的决断、从而成为英国与世界诸大洋的婚约的真正担保人的呢？

人们不能说，那个时代的英国政策、英国国王们以及政治家们对于这个令人惊异的进程怀有一种历史意识。见风使舵乃是16、17世纪时的英国官方政策。对于海洋的决断这一崭新的空间革命的转向从未事先提供过一个明确的、有意识的蓝图和前景。不难理解的是，它试图利用任何的机会，不惜采取任何一种立场。但是，它并不比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更为“现代”。因此，正如英国直

到17世纪末才作出对抗皇权绝对专制的最终决断，它在宗教方面对于世界新教和世界天主教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宇宙观的冲突的决断同样是缓慢进行的，并不具有一种世界历史的意识。这种转向是缓慢的，实际上并无宗教上的决断。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府步天主教化了的斯图亚特王朝之后尘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广大民众的宗教狂热直到清教革命时才出现。宗教领域里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乃是宽容和良心（信仰）自由。英国的各种中世纪建制比起欧洲大陆上所存留的要远为保守。美洲殖民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以封建法中的土地出租的方式进行的。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议会经过许多波动之后仍然固守着它的权力。决断、尤其是与法国国家及其民族精神相契合的法律意义上的决断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因此，即使在关于海洋的自由性这个问题上，英国的立场也曾经缺乏一种深思熟虑的原则。正如他们的整个民族那样，都铎王朝以及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达到致富的目的，对海盗们所掠夺的西班牙财富并不抱歧视态度。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方式与那位令人尊敬的吉利格鲁夫人处理家政的方式并无两样，以殷勤好客的资助人的身份，那位夫人以其位于阿维奈克的家族为根据地，与一些身份暧昧的绅士和真正的海盗一起经营着巨额的和利润丰厚的生意和交易。整个吉利格鲁家族乃是一个极好的、典型的个案，对于那个时期的英国的历史现实而言，对这个家族的考察要比考察许多官方文告和宣言有教益得多。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发布的官方文告的语言和论证方式仍然脱不出古老的

罗马法和自然法的常规，毫无新意。它们没有超出自然法与罗马法的表达方式，对这些表达方式西班牙经院学者了然于胸，而且几十年前法国人就开始讨论这些东西了。比如，当英国女王1580年向西班牙使节声称，海洋和空气是自由的，任何人可以共享时，其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与16世纪的法国国王们关于海洋之于人类和各个民族的公共性和共享性的无数类似的表达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的，在长达百年的关于海洋的自由性或封闭性的“书籍战争”（正如Nys所称的）中，英国作家们的论证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和首创性的意义。当然，在这场论争之前，一本奇特的、天才的作品就问世了，那就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本书的出版本身乃是一个颇具意义的事件。在这本书里，“乌托邦”这个概念所表达的那种极其新异的、否定性的空间想象之所以成为可能，预示着一种深刻的空间革命的来临，这种空间革命16世纪时支配着这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的心志和情感。然而，托马斯·莫尔的这部作品出版于1516年，几乎早于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时段两代人的时间。人们当然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并且认可其——正如格哈特·里特所正确地强调的那样——象征性意义，但是，它并没有触及海洋的自由性的具体的国际法问题。它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关怀，在智慧和教养上从属于这样一类作品，这类作品乃是17世纪的英国作家为着海洋的自由性这个实际问题而撰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乃是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在17世纪所进行的这场漫

长的关于海洋的自由性的争论中，英国作家基本上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斗争，一方面，针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商业垄断，他们倡导一种普遍的、在自然法上已经由维多利亚（Vitoria）予以辩护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针对荷兰人的海权诉求，则强调对于与英国毗邻的诸海洋、即所谓的“封闭的海洋”的垄断权。

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理解，荷兰人格劳修斯由于其1609年匿名发表的作品《海洋自由论》，从而成为倡导海上自由的第一个先行者。这个作品是写于1605年、然而直到19世纪即1868年才予以出版的更大的一部作品《战利品法》的一个章节。更新一点的研究表明，格劳修斯对于阿尔伯利库斯·根梯利斯（Albericus Gentilis）的那本《战争法》曾经是多么地倚重，而且，他还复述一些西班牙经院学者的论述用来为商业自由辩护。他还没有把世界诸大洋在同样的意义上视作进行海战的自由的世界性舞台。而伴随着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的签定，海洋的自由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发展后果乃是，它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与这位荷兰人在其1609年的那本好心的作品中所展望的截然不同的图景。无论如何，“自由的海洋”这个标题还是发挥了标志性的影响。相比之下，那本著名的、被多数英国人——无论是斯图亚特王朝还是克伦威尔、甚至还有霍布斯——认可的与格劳修斯的论战作品即英国人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的《海洋封闭论》（写于1617—1618年，出版于1635年），却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传统的观点，人们既没有想到这个海岛将会成为一个建立在海洋基础之上的世界帝国的都城，也没有意识到地球上的世界图景的巨变。17世纪的英国人主要对与英国毗邻的海洋问题感兴趣，如北海（也就是“日尔曼海”），英吉利海峡，比斯卡亚海湾，等等。北海渔民的争端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的一个主要争执乃是英国对于所谓的“海上礼炮”的权利要求，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船只在英国周围海域上行驶时应该对英国船只鸣放礼炮以示敬意和歉意。第一个真正意识到英国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诉求与那种新的以海上航行自由为名义的海上霸权这一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矛盾的英国人似乎是菲利浦·米都斯爵士（Sir Philip Meadows）。他的《关于海洋霸权和海洋主权的省察》出版于1689年，这是第一部注意到了18世纪的乌特勒支和会之后诞生的关于自由的海洋这一新的世界图景的英国作品。当米都斯的作品问世时，发展的步伐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几年之后随着乌特勒支和会的召开，一直到20世纪仍具权威性的自由的海洋的观念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无论是海上贸易自由，还是进行海战的自由。因此，人们不应该被关于海洋的“自由性”或“封闭性”这样的书名所迷惑。在这种书名之下，处理的却是与欧洲海盆相关的古老的、地方性的或区域性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捕鱼业，并非是那种遍布世界诸大洋的规模宏大的捕鲸业，而是荷兰、苏格兰、挪威的滨海捕渔业。至于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与自由的海洋相关的真正的国际法问题，如海战中中立国之于参战国的权利，也就是说这样一个

令人困惑、归根结底无法解决的问题，同一公海海面何以能够成为自由、和平的贸易场所、同时又是战争的舞台，这些问题尚未进入撰写那些小册子的人的意识之中。然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它不再与那些地方性的或区域性的北海问题、东海问题或者英吉利海峡问题相关，而是与行星视角下的陆地与海洋、坚实的陆地与世界诸大洋之间的世界性决断相关联。

既不是英国政府也不是在关于自由的海洋的“书籍战争”中使用这个概念的英国作家们促使了这种向海洋的转向。无论是英国的政界精英还是思想界的精英都不能以成就这一功业而自夸。另外一种人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16、17世纪时，卤莽且不怕冒险的实干家、勇敢的航海者以及海盗们促成了英国与海洋的联姻。新的能量从英国民众的力量中喷薄而出。他们贪婪地向海洋扑去。对他们来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财富只不过是掠夺更好的战利品的契机。关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本虽然不够系统、但材料丰富的关于海盗史的书的英国作者对他们做了这样的评论：“他们把一块贫瘠的土地经营得颇为富裕；但是，这一点要重要得多，他们也将一个强悍的海洋民族引入历史，把英国从困顿中解救出来，替英国扫清了障碍，使得英国成为海洋上傲慢的女主人”。毫无疑问，西班牙人把英国人看作和当作海盗。然而，海盗这个称呼也太宽泛了。16、17世纪时，以私人身份参加战争还是名正言顺的事情。战争还没有成为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且，格老修斯仍然把以私人身份参加战

争视为一种自然的权利。在这个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世界性争斗的转折时期，无论是有组织的团体与单独的个体之间的界限，还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以及由此而来的海盗与战争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因此，16、17世纪的海盗史与早先的或后来的海盗史都不雷同，无论是古代还是中世纪，无论是地中海上海盗蜂起的时代，还是19、20世纪的中国式海盗船的时代。尤其是，从这个背景来看，17世纪的处境与其后的18、19世纪时的处境完全不同。里斯威克和约（1697年）与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的签定成为一个深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在此之前的相当模糊的过渡状态基本上终止，欧洲国际法步入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国家主权的时代。战争越来约明确地成为国家的战争，即使是英国也消除了私人性的劫掠者，倘若他们不接受官方的贸易公司的法律形式。里斯威克和约之后，成千上万的海盗没有了饭碗，沦为赤裸裸的罪犯。除了为数极少的例外，如那个在马达加斯加试图将其人道主义理想付诸现实的法国布道团以外，海盗成了一种悲惨的、犯罪的象征性群体类型，关于这个类型，只有在天真无邪的浪漫故事中还能充满诗意地找到他们的身影。诸如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样的所谓的海盗国家只是在欧洲诸海权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此外，欧洲诸国的海洋警察和海洋法庭如今也轻而易举地与海盗们断绝了关系，当人们把海盗视为人类的敌人时，它似乎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恶魔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耀了。

这些16、17世纪曾经参与到对抗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

斗争中的海盗们，当时生活在国家与私人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状态。我无意赞美他们，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们与那种被归结为“海盗”的无法无天的罪犯还是两码事。根据国际法教科书中的通行的界定，海盗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他不加区别地抢劫所有国家的船只，因为除了最卑微的贪欲他没有其他动机，于是，他就成了道德不够高尚的小偷。相比之下，另外一种与我们的论题颇为相关的航海者们却有政治上的敌人；就他们理应获得某种历史利益而言，在一场宏大的世界性斗争中，他们站在了胡格诺—荷兰—英国这个新教阵营对抗西班牙的天主教阵营。从中涌现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名字，尤其是诸如德雷克、霍金斯、格林维尔、佛罗比舍、卡姆伯兰这样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属于这个范围，如罗切拉的胡格诺派海盗，他们以拉罗切拉为基地劫掠天主教船只，直到他们惹得伊丽莎白不耐烦时，于 1573 年被打败，并被逐出英吉利海峡为止；然后是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海盗，他们的首领迈诺瓦凌 1616 年被詹姆斯一世赦免，谢世时是国会议员以及多佛城的统治者；再后是布卡尼海盗，所谓的“海滨互助会”，既有法国人，也有英国人，他们从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为基地，打破了西班牙的封锁和贸易垄断，其他最后的著名行动乃是 1697 年与法国皇家舰队一起夺取卡塔津那。而且，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人的名字，如法国的加尔文分子莱瓦索，莱格兰特，洛罗诺，以及他们中最有名的亨利·莫根爵士（Sir Henry Morgan），1671 年他劫掠了巴拿马，后作

为囚犯被解往伦敦，在那里被詹姆斯二世擢升为骑士阶层，然后作为皇家总督返回牙买加就任。我们还可以把其他一些“海的儿女”添加上，尤其是那些童话般的捕鲸者。他们推进了航海艺术的发展，而他们的这一成就迄今为止还不为人知。他们的工作促成了人类的、政治的存在与世界诸大洋这一新元素的联姻。所有的这些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成就都被英国继承了。人们应该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名分、而且应该怎样论说他们才最恰切呢？

参与这场世界历史争斗的勇敢的海盗们大多持有官方的委任书，肩负着政府的使命。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他们是有法律身份的海盗（Korsar）而不是没有法律身份的海盗（Pirat）。当然，这种“委任书”常常是相当模糊和不确切的，尽管这些官方文书有其确证性，但并不总是很当真。有的人的确持有官方的委任书，但官方对此人却一无所知。除此之外，政府还保留着根据外交需要随时取缔其合法存在的权利，尽管他们接受过这些海盗的帮助和馈赠。政府很乐意将就这些卓有成就的战斗伙伴，然而，这些海盗的勇气却是非官方的。出于与西班牙维持和平的考虑，这些海盗们经常被政府出卖，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被绞死。因此，海盗们需要完全自担风险，他们是以私人身份而不是以官方身份参加战争。由此，对于他们的最恰当的描述乃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个体户（Privateer）。这个称呼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让人们认识到，人们不能把诞生于今天这个高度国家化了的时代的关于战争和战士的标准和理想嫁接到这样一

个时代，这个时代还没有使战争国家化，而是把那种通过国王的委任书而被授权的自由雇主的战争行动看作合法的，尤其是，也听任私人雇主遭受国际法的报复。

从这种“个体户”出发，英国的世界图景才能予以最好的理解。只有从他们出发，当时所进行的那个具体的世界史上的决断才能看得清楚，无论就其独一无二的历史特殊性而言，还是就其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影响力的广度而言。不是某种国家组织，而是这些个体户，才是选择海洋而不是陆地这一决断的历史承担者。正是他们作出了对于海洋这一元素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断，在如下意义上：这一决断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直到那时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人们对于所谓的世界诸大洋以及行星间的世界图景还毫无感知。与这种把海洋作为人的、政治性存在的元素这一决断相比，宗教的、各教派之间的阵营和争论就成为次要的了。直到现在，欧洲世界及其国际法秩序才开始分裂为陆地和海洋两个部分。

对于海洋的决断的影响首先在于，这个海岛本身的实质和内容发生了改变。与几百年前和几千年前的海岛相比，英国这个海岛如今已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了。那种所谓的英国历史和本质中的海岛性格的说法本身，还不能完全说清楚发生在16世纪下半叶的那次世界历史的转向。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海岛”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西西里也是一个海岛，日本也不例外，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定的三国条约还认可了日本对于东亚大陆的空间秩序要求。几千年

来，英国就是一个海岛，无论是尤利斯·恺撒的时代，还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征服者威廉的时代，或者是奥尔良的圣女贞德的时代。在早先的时代，英国本身也自认为是一个海岛，但却总是这样一个海岛，即它是一块从欧洲大陆脱落而出的碎片。这个海岛一直维持着其隶属于欧洲大陆的一部分的身份。人们将海洋看作一种天然的壕沟，相应地，这个海岛就被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要塞和水上城堡。这还完全是一种以陆地为中心的观念。在这个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乃是有理由予以强调的、在塞尔登《海洋封闭论》（第二卷第25章）中也引述过的发生在1435－1436年间的“对于英国政策的诽谤”。其中这样描述道，英国应该承担起“海洋的统治权”，并夺取多佛、卡来斯、佛兰德沿海地区以及从苏格兰通向西班牙和普鲁士的海路，并成为这样一个都市：海洋乃是其护城墙。

尤其要使它们被海洋环绕，
环绕英格兰的海洋则成为一堵圆墙，
英格兰似乎是一座城，
而围护这座城的就是海洋。

甚至中世纪时的英国印章与早先那些国家的印章也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乌珀教授——我要感谢他给我解释这些印章的含义——向我指出，像其他那些日尔曼国家一样，英国的印章同样显示出那种典型的、古老的四分法特点。仿照其他

日尔曼—基督教印章，古老的英国国王印章描画的是一个头戴王冠的国王的形象，与海洋没有任何特别的关联。然而，一枚由克伦威尔在其“重获自由的第三年”即 1651 年创制的印章上就凸显了英格兰这个海岛的地理图景（没有苏格兰），在其一侧显示的是作为海岛的爱尔兰的地理图景。海岛的生存感觉完全有可能是陆地性的，而这正是 16 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英国的情形。这种把海岛理解为一种被大海像护城河一样地守护着的城堡的观念甚至可以强固那种领土意义上的土地意识和本能，导致一种狭隘的陆地中心主义。由此，我想作如下说明，在最近几十年的国际法学者中，一个英国人，即在很多其他国际法理解上都颇有创见的贝蒂（T. Baty），对那种“领土的绝对神圣不可侵犯”有着最极端和敏感的认识。在他看来，领土的完整性乃是当今国际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在国际法中，以无条件地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为一方，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为另一方的两分法仍然生效。领土完整如遭受任何一种暴力损害都将意味着战争，而那种诸如“和平的报复”或者“和平的封锁”的中间状态，在他眼里乃是无与伦比的谎言，这个谎言将那种建立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区分之上的国际法彻底摧毁了。

对于这种孤岛式的陆地主义的个案，我们有必要至少简短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有与海洋以及海洋问题有关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制于陆地视角的。我们把在公海上航行的船只叫做“游动着的国家领土”，而且谈论什么船只的“领土特点”。这是一种典型的陆地思维，和那种把战船

理解为“游动着的要塞”的思维一模一样。甚至在海上航路这样的词汇中，其含义也只能从陆地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某种由陆地决定的想象才似乎是有效的。对于天空而言，人们不再说空中航道，而说空中交通线。当三海里领海——18 世纪时的加农炮射程——区域的规定生效时，这种计算方式也是以陆地为参照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也可以有反过来以海洋为参照的区域划分法。从海洋看陆地的视角不仅仅对于个别的陆地关联物才是可以想象的。对于人类而言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有可能彻底地、完全地以海洋为基点进行生活和思考。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将其政治存在全部安置在海洋这一元素中。理所当然地，它将在政治和历史上呈现出与那种陆地性存在截然不同的面相。这时，这个海岛将不再是陆地的一块弃物，而将成为海洋的一部分或者海洋的造物，一只船，或者甚至一条鱼，一头巨大的鲸鱼，利维坦。霍布斯那本出版于 1651 年、取名叫《利维坦》的书错误地、欺骗性把这种巨大的鲸鱼的形象用来构建一个国家，而这种国家却并没有在英国实现，而是在欧洲大陆成为现实。这种“国家”成为了一种陆地的空间秩序，而海洋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脱离于国家的。因此，那本书——如果霍布斯真的曾经认真对待过作为元素象征的那些巨兽们的神话意象的话——不应该按照海中动物利维坦、而应该按照陆地动物波希墨特取名的。与把利维坦作为国家秩序的象征相反，霍布斯试图使陆地动物波希墨特成为革命的象征。从神话的角度来看，那完全不可能。就其对神话缺乏感知力这一点来看，

他仍然是一个启蒙者。就其作为一个英国人这一身份而言，他还完全属于岛民中的陆地性的、而不是海洋性的类型。他还不是他那个时代里的英国人中的一员，那些英国人选择了海洋这一元素，全身心地打上了海洋的烙印。因此，当利维坦被用作海洋的象征来与陆地进行比较时，人们想到的不应该是霍布斯及其国家理论。我们似乎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个海洋性神话的真实事件，作为一个生动的从海洋的角度观察问题的相反例证，这就是令人震惊的伯克的话，他是从海洋的角度来观察和评点西班牙的：“西班牙是一头搁浅在欧洲海岸上的巨鲸。”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冲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为了正确地从海洋的视角对我们这个行星进行描述，事实上，人们看来必须从一种海洋的视角、而不是陆地的视角来谈论这个问题。

乍一看上去这似乎是不同寻常、自相矛盾的。但是，它却与国际政治和世界史的现实相匹配，人们必须牢记这一现实，这样才能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海洋的角度来理解最近几个世纪中不仅是英国而且还有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里所发生的事件，也才能了解迄今为止的欧洲国际法是什么东西。陆地，以及从海洋的视角来看一切与陆地相关的事物，乃是关于空间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冲突，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乃是与生俱来的，它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我们将我们所生存于其上的这个行星理所当然、毋庸质疑地称为“地球”。当我们谈论我们这个行星，并且悄悄地把海洋理解为陆地的一部分时，我们就称其为“地球”。一种陆地的、以及与陆地相关的思维方式试图从陆地的角度发现海洋的秩序。但是，另外一种从海洋的视角获得的关于我们这个行星的图景却使以下事实成为不言而喻的，即海洋的面积远远超过陆地的面积。人乃是这样一种存在，他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地主宰自己的环境。他必须“直面和承担自己要往何处去的自由”。他也能够选择海洋作为其历史生存的空间，并尝试从海洋的视角来统治陆地，从海洋、而非陆地的视角来安排这个世界。在此意义上，海洋主宰着陆地，陆地的秩序屈从于海洋的秩序。这就是我所说的根本的冲突。这也是海洋民族所理解的海洋的自由，只有从这个角度出来，人们才可以着手对自由的海洋这一更新的国际法问题进行研究。由于海洋与陆地的冲突，欧洲诸民族的世界图景朝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方向分解为两个阵营。正如刚才已经提到的，从中也产生了两种彼此对立的道德立场，两种不同的世界一历史图景，尤其是，产生了一个分解为两个阵营的国际法概念体系以及与其相应的两种不同的战争与和平的观念。从16、17世纪开始，英国才在其政治的整体性存在中选择了以海洋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对抗欧洲大陆。

许多人们经常探讨和强调的所谓的英国精神和英国政治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以最好的理解。尤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并没有像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国家那样成为所谓的“国家”。英国并没有产生那种典型的国家建制，如常备军，官僚机构，一部成文宪法，国家法典中的不成文普通法的变更，等等，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运转。人们经常这样说道，

其岛国的地理位置取代了常备军、国家官僚制度以及成文宪法并使其成为多余的。这完全正确，但还不全面。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英国的以海洋性的战争观念与欧洲大陆的陆地性的战争观念的巨大冲突时，人们才能认识到这元素之间的冲突的全部含义，而这种冲突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通行的国际法教科书的描述里，这种冲突的强度之所以被掩盖起来，是因为人们把国际法区分为“一般的”国际法和“特殊的”国际法。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国际法”，恰恰相反，那种所谓的“特殊的”国际法正是英国以自由的海洋为根基的世界霸权诉求的最高表达，以至于成功地使得英国的海战方式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则。我刚开始时已经提到过两种国际法秩序即陆地性的国家主权间的关系与海洋性的自由或者说非国家性之间的冲突，在此就不再对两者关于战争和敌人的概念进行解释了。但是，古斯塔夫·拉岑霍夫 1881 年提出的思想却值得特别一提，虽然这个人在国际法领域根本不受重视，因为他能够最好地廓清这种冲突的根源。这位伟大的奥地利军事学家指出，陆战主要以空间、陆上交通线、地盘为目标，而海战并不以“空间”、而是以活动着的交通工具为目标。因此，大陆国家的海战主要以登陆或者保卫海岸线为目标。相比之下，英国进行的海战着眼于经济方面的控制区域，试图挤压弱小的海上势力，干扰其贸易。从目标、手段以及法律观点的种种差异，拉岑霍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全部意义直到 60 年后的今天才变得清晰起来。他认为，一个不尊重其他国家在

海上的财产的海洋国家，其领土和公民的财产一旦意外着陆也同样无法受到尊重。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这种总体立场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及其主要特征，这种总体立场在所谓的“与海洋成亲”的宣称中获得了表达。首先是：英国统治的非国家的社会特征，“间接的”统治方式的主导性，以及我所说的海岛的“无根化”（Entankerung）——

第一，与陆地性的世界帝国不同，海洋性的大英世界帝国并非是国家组织的产物。这个帝国既不能界定为邦联，也不能定义为联邦。所有陆地性概念的移植以及以“国家”这一概念为轴心的建构体系必然会在这里搁浅。私掠船、贸易公司、商人冒险家、清教流亡者创造了这个海洋帝国，而不是国家创造了这个帝国，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它还反对任何趋向国家化的萌芽。这一事实真相在 1916 年的世界大战期间由一位英国人在一句著名的话中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这句话值得在这里予以引证，因为它不仅触及了这一事实的世界观的核心，也击中了其历史的、政治的要害，而且几年前在一个颇为有名的、典型的美国式的对“现代国家”理论的描述里，这句话被强调为深刻的真理：“17 世纪英国的扩张乃是一种社会性力量的扩展，而不是国家力量的扩展。为了逃避国家的压迫，社会性力量开始向外拓展，当这个国家与法国和加拿大殖民地进行了两场战争，开始试图赶上正在自我拓展的社会的步伐，重新施加其影响时，试图抵制一个帝国成为现实，一种新的国家间的联盟诞生了。”19 世纪的信条

在这种思想中原封不动地显现出来，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赫伯特·斯宾塞，布克尔（Buckle）以及诸如此类的哲学家。在他们眼里，国家和政治乃是邪恶的东西，且意味着战争和黩武主义，而社会则等同于工业主义，私营经济，因此意味着进步与和平。由此，所有的东西都汇入自由的、也就是与国家无涉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中。这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也是一种历史建构，结果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主宰以及世界和平的内容和保证。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世界霸权能够随心所欲地消除战争，因为，在它看来，经济制裁的手段，封锁，以及“经济施压”似乎足以粉碎任何抵抗。

第二，这种由某种“社会”承担起来的世界帝国的结构与所有其他的那种由国家的或者民族的组织手段拼接而成的结构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面对英国的统治方法的独特性，那种所谓的“结构”或“建构”的说法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了。这种说法和想象过于国家化和陆地化了；它们让人过多地联想到了建筑物和建筑学。出于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几年前有人曾经对“大英帝国行将瓦解”的声称这样反击道：“大英帝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接缝。”英国是通过“接缝”（Fuge）以外的其他方式结合为一体的，英语中根本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汇与接缝相对应，而只是笼统地说“接合点”（joint）。诸如“结构”和“接缝”这样的观念太“直接”了。英国的统治与那种最宽泛意义上的“间接权力”的手段和方式相适应。对于一个经由海洋对陆地施加影响的权力来

说，这种间接地施加影响的权力运作方式乃是典型的统治手段。在其海权发展的所有阶段，英国总是能够将这种间接的、时常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总是越来越有效的权力手段付诸行动，无论是对付那些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海外民族”，还是对付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国家。英国海权发展的三个世纪里都验证了这一点。18 世纪时共济会运动已经从属于这一潮流。作为一种秘密的社会性组织，它最为稳妥地掌控了那种所谓的自由的“公共”舆论。乌特勒支和约以及路德维希十四死亡之后，共济会的权力开始显现。这里我们将要考察的第一个共济会分会成立于 1717 年。其活动从伦敦开始，18 世纪时伸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从里斯本和马德里，中经巴黎和柏林，最后到达彼得堡。博爱观念的惊人传播以及在极短时间内覆盖全欧洲的政治宣传方面的成就，比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作品，就是共济会的功劳，没有它是不可想象的。在此后的 19 世纪，共济会仍然在发挥其影响，然而，此时自由宪政的宪法运动成了英国向大陆施加影响的典型手段。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考虑，在欧洲所有国家粉墨登场的自由和宪政运动有意无意地变成了英国的世界霸权的工具。尤其是，在以下一点宪政主义找到了其世界霸权的意义，即，在任何一个宪政国家中，无论是经济还是出版，也就是公共舆论的培育，乃是与国家相脱钩的领域，或者说私人的事情，它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与“自由的”世界市场和出版业相融合。最终，在我们当今的 20 世纪，1919—1933 年的日内瓦国际联盟成了英国世界霸权的此类间接统治方式的组

织的一种尝试。经济制裁，经济和财政上的抵制，所谓的“经济压力”，道德上的谴责以及使其处于非法地位，所有的这一切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机制，任何一种抵抗都将消弭于无形，如果德意志帝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最后一刻不与之脱离的话。

第三，最后，这个岛屿从大陆的一部分转变为一只船或者干脆成为一条海中的鱼也解释了那种起航的意志，而这一意志对于大陆上的观察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借助这一意志，英国的政治家们能够考虑将其世界帝国的中心从欧洲的一个岛屿迁往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的可行性。这样一种迁移（Exodus）的想法不是迫于 1939—1940 年的战争的压力才浮出水面的，即使当今战争的绝望局面就已经使这一构想丧失了直接的现实意义。迪斯累利，这位先知先觉和行家里手，19 世纪时已经提出了这个建议。在其 1847 年的小说《唐克雷德》或者《新十字军东征》（*Der Neue Kreuzug*）中，有这样的话：“恳求英国女王组建一支庞大的舰队；请求她将其整个王室和领导阶层迁走，把帝国的首都从伦敦迁往德里。在那里她将找到一个巨大的、现成的帝国，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以及一笔巨大的收入。”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听到的英国政治家们关于迁往美国去的可能性的讨论，几乎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只不过是从欧洲迁往印度罢了。甚至，它的起锚这一构想在 16 世纪英国对于海洋元素的决断中就可以获得解释。这个岛屿变成了一支船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条巨大的鲸鱼，像一个利维坦遨游在行星的另

外一个地方，一旦它的安全受到威胁。

我们的考察以英国的国际法秩序的核心概念、国家主权及其第一个法学定义为出发点。然而，国家主权只不过是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中的陆地性的一面。当我最初谈论它时，我并不想把它引领到关于邦联和联邦、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完整性及其可分性和不可分性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概念分歧之中，也不想把欧洲各个民族的生存问题毫无生气地肢解为混乱不堪的各种定义。它更多地与那种根本（elementar）秩序的冲突有关，即在“元素”（Element）这个词汇的本来意义上的冲突。与这样一种主权“国家”——即它乃是陆地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法的承担者——相比，另外一种海洋性的世界秩序作为世界秩序的相反一极将会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只有从这种与国家无涉的海洋出发，世界秩序的总体图景才是完整的，而且，任何一个忽视这种海洋性世界秩序的人都将成为某种法学幻想的俘虏。

然而，从这种海洋性世界秩序出发，当今的国际政治对抗就能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的世界历史意识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年英国与海洋这一元素予以存在性联合、以及大英帝国得以奠定基础的历史处境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英国航海者对于海洋的掠夺基于某种特别的成就，也就是航海的成就。在这个方面，英国人事实上超过了其他的民族。但是，科技的发展，不可思议的新的技术手段以及新的海战武器不仅已经远远超过了那种航海技术和成就，也与 16 到 19 世纪

时的处境大为不同了。尤其是，对于太空的征服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图景，它克服了迄今为止的陆地与海洋两种元素的区分，创造出了崭新的空间概念，崭新的尺度和维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崭新的空间秩序。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我几年前就说过这句话、但人们经常误解它——来概括：“海洋不再是一种元素，而是变成了一种人类统治的空间。”这一发展促成一种崭新的、超越了陆地与海洋这一古老的冲突的大地的大空间秩序。新的力量和能量担负起了这一崭新的空间革命，而且，这一次应该由德意志民族取得领导权。*Ab integro nascitur ordo*。[①]

① “秩序即将重生。”——译注

关于陆地、海洋与天空的对话

一

A：我们还是从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开始谈起，首先来谈一下陆地性存在和海洋性存在的区别，对于这个区别，我们尊敬的朋友唐·卡米洛做过详尽的国际法解释。在此，亲爱的N先生，我可以问一个冒失的问题吗？

N：如果不是过于冒失，尊敬的A先生，请便！

A：希望不会过于冒失。我只想问您一下，您是否偶尔也读一读《圣经》？

N：您指的是《旧约》还是《新约》？

A：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么细微的区分。我指的是那本通常所说的《圣经》，书中之书，两个，旧约和新约。

